

第八章 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与抗击反共逆流的斗争

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军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日本侵略者为实行其所谓“以华制华”的方针，在占领区内扶植和强化傀儡政权，建立“新民会”等汉奸组织，在察南、晋北等地建立地区性的傀儡政权。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为弥补其兵力和资源的不足，加紧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大肆劫掠占领区的资财，通过汉奸和奸商从国民党统治区高价抢购大米、桐油、铜元等战略物资，以补充日军的给养；发行货币，编制金融、掠夺工矿资源和农副产品，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

在日本诱降、美英等国劝降之下，国民党营垒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分裂。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汪精卫投敌叛国。而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留在抗战阵营，但已日益动摇，且与日方秘密进行妥协、讲和谈判，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美、英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这次全会的决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随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接连制造磨擦事件，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并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由此出现严重危机。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

身建设，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

对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对时局要有清醒的认识，一面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一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还明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开展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敌行径。同时，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一方面坚持团结抗战，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的正确政策；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为各级党组织坚持团结抗战与战胜反共逆流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于1939年1月在韶关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检讨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重新估计抗日战争与国内的环境。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长期积蓄力量，并且积极在战争过程中培植自己的力量，准备将来抗战的最后阶段上能起决定作用。会议明确了新形势下广东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1) 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2) 扩大动员群众组织；(3) 建立统一战线；(4) 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

在南路，从1939年5月起，蒋介石的亲信、特务头子蔡劲军专门窜到高州、电白等地活动，分别向南路各地区反共顽固派面授反共机宜，配合蒋介石在全国掀起的反共逆流。广东国民党政府特地高州设置南路行署，美其名说是加强南路的行政领导，实际上是为了监视抗日爱国将领张炎的行动。南路国民党顽固派在蔡劲军的旨意下，与南路行署相配合，不断派遣特务侦察和破坏南路各级中共组织和抗日团体的活动。

在北海，国民党顽固派在蒋介石集团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加快了反共步伐，掀起反共逆流。特别是合浦儒家巷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合浦当局进一步加强了“防共”、“限共”措施，北海地区的国民党官僚地主反动势力的反共活动非常嚣张，疯狂地进行反共宣传和镇压群众的抗日运动，加强特务活动，强化保甲制度和保队（武装）；控制中小学校，强迫学生和教师参加反动党团；查封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部，解散北海、合浦的抗日后援会和战地服务团；廉州中学、合浦一中、合浦五中等学校的一批学生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被开除学籍。国民党军警还经常进行突击的户口检查，加紧追捕已暴露的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局势一时显得十分紧张，北海地区的中共组织活动一度中断，不少党员被迫转移，个别党员的情绪也一度受到影响，北海地区的抗日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

合浦儒家巷事件

由于北海地区的抗日运动在合浦抗日青年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更加蓬勃发展，其声势之大、人数之多、群情之激昂，令国民党合浦当局震惊，并认为这一定是共产党从中组织和领导。因此，国民党合浦当局采取了跟踪、监视、密报等特务手段，密切注意着中共的动向。1939年6月上旬，从香港来到合浦县城的叶惠清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合浦中心县委书记李士洋认识叶惠清后，擅自决定让叶惠清到合浦中心县委机关驻地居住。当国民党特务跟踪叶惠清来到廉州儒家巷蔡屋时，确认这里是中共的秘密联络机关驻地。6月16日晚11时，正当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成员李士洋、陈任生、张九匡、利培源及叶惠清等聚集阅读由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主任干事、地下党员庞达转来的国民党机密文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被国民党一七五师便衣队（特务连）包围，然后由一七五师政治部情报科长罗宝瑚、参谋处参谋陈浙民以查户口为名强行闯进蔡屋搜查。在搜出一些马列书籍和中共的文件后，将李士洋等5人拘捕，留在原地秘密囚禁，并轮番审讯。然后把李士洋等5人押至灵山石塘钟秀岩监狱关禁，并将有关情况向国民党桂林行营、重庆国民党中央作了报告。在县委机关被破坏的第二天，庞达和赵世尧通知余下的县委委员开会，商讨对策，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被捕党员的表现。在基本情况弄清以后，派张进煊到广州湾向南路特委作了汇报。

1940年4月，日军自钦县向灵山攻击，直攻到石塘。此时石塘钟秀岩监狱附近机枪大炮声密集，监狱的负责人和守狱人员仓皇逃遁，李士洋等5人便和狱中的其他囚徒一起乘机破门而出。李士洋等5人越狱逃出后，先潜到谢王岗的家乡福旺镇脚村（今属浦北县）隐蔽，再转到卢壁光家乡枫木村住下。然后通过那里的群众关系，先联系上谢王岗，再联系上合浦县委和南路特委组织。李士洋等5人从合浦县城被捕至灵山县石塘钟秀岩越狱的全部过程中，一直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始终没有说过有损于党组织的口供，没有泄露过党的秘密。

1940年，经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反复审查，认为发生合浦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县委机关主要负责人对国民党反共实质认识不足，对国民党的反共逆流没有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以至于思想上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没有切实清理和处理好党的文件，工作上违背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最终导致党的工作的损失。儒家巷事件的发生，也暴露了合浦党组织领导上的重大缺点：党的工作重点在城市，在上层和知识分子中，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工农出身的党员太少，农村（北部山区）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存在着幻想和依赖心理。

国民党大肆进行反共宣传

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国民党提出的策略口号是“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取理论”，妄图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国共两党刚刚达成合作协议，蒋介石就在《对共产党的宣言的谈话》中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立国原则”，“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即三民主义。1938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武汉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国民党的“宣传家”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

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合浦县当局也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在各种场合加强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控制，并镇压北海地区的进步活动。合浦儒家巷事件发生后，邓世增怀疑赵世尧与共产党有联系，并指派林增华通知赵世尧到合浦谈话。邓世增见到赵世尧之后，一面多方探究赵世尧身份，一面又假惺惺夸奖赵世尧的才干和能力，企图拉拢赵世尧为国民党政府卖力，同时又警告赵世尧不要受异端邪说蛊惑，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对思想较为活跃的青年学生，国民党合浦县当局更是深感不安，对各校的校长进行了调整，任用一批思想反动，坚决反共的极右分子担任各校校长。这些极右分子上任后，收买思想反动的学生为特务，对进步学生的活动进行监视；又在学生中强行灌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反动思想，在公开场合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不击；还通过大力发展三青团的办法，争夺青年学生，各中学的高中学生不管是否愿意，一律填表加入三青团，稍有抵制的便被列入黑名单。对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学生，学校反动当局便诬蔑他们是不务正业，危险分子并常常借机找茬儿，搜查他们的宿舍，对他们训话，或开除学籍。1939年合浦各中学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就有罗永莹、谭俊、卢文、伍朝汉、陈铭金等一大批人。被开除学籍的学生都冠以“思想赤化”的罪名，一些人还被通缉，这时人心惶惶，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退出了革命队伍。

二、县委机关的恢复与党组织的整党审干

县委机关的恢复

1939年5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五次执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和中共南方局《秘密工作指示》，研究广东反逆流斗争问题。7月上旬，广东省委再次就反逆流斗争召开第六次执委会议，会议决定将逆流情况向全体党员传达，提高全体党员的警惕性；党的工作重点也转入以巩固组织为中心，通过清查党员成分，转移暴露干部，加强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等工作，教育党员严守工作秘密；巩固现有群众团体，坚定信心，坚持工作；在活动方式上，由集中转到分散，由高级转到低级，由政治化转到经济化、福利化，由国民党外转到国民党内，主要目的是继续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反逆流斗争的宣传。中共广东

省委派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温焯华作为巡视员，向南路各地方党组织传达这两次省委执委会议的精神。

7月，广东省委派温焯华到合浦审查县委机关被破坏事件，恢复合浦县委机关，并传达中共广东省委第五次、第六次执委会议精神。8月，在温焯华的指导下，在白石水金街小学召开中共合浦县委扩大会议。县委委员张进煊、赵世尧、李英敏和各地党员代表谢王岗、朱明、邹贞业、陈业昌、郭芳、庞达、张书坚、黄模、李秋等出席了会议，张世聪和岑月英列席了会议。温焯华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五次、第六次执委会议精神；作关于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合浦中心县委工作及县委领导机关被破坏的教训，指出合浦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是县委机关主要负责人对国民党反共实质认识不足，对国民党的反共逆流没有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的结果，以至于思想上麻痹大意，工作上违背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最终导致党的工作的损失。会议决定，今后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山区农村，开展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发展党员等工作，着重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领导，恢复成立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仍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书记张进煊，组织部长谢王岗，宣传部长李英敏；委员张进煊、谢王岗、李英敏、朱明。由于赵世尧在儒家巷事件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决定不再参加这一届县工委工作，由温焯华派遣前往粤北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并就地参加由省委主办的党员学习班。而韩瑶初调离未成，以后消极退党。

中共合浦县工委按照这次县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到山区农村。首先，把县工委机关驻地转移到农村，设在合浦县白沙宏德小学，真正做到把重点放在农村。然后，在全县把白石水作为山区农村的重点，把小江作为附点，调整充实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加强了山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新建立了中共廉北区委（管辖北海、廉州、南康、福成、营盘等地党组织）、中共白石水区委、中共小江区委，书记分别为庞达、李英敏（因在县委机关不便秘密活动，调任白石水区委书记）、李秋；把中共寨圩支部改建为中共寨圩特支，书记为陈业昌；改组中共北海特支、中共西场区委、中共公馆区委，书记分别为郭芳、黄模、邹贞业。把暴露的城镇干部撤退到农村，如抽调何若之等到白石水区工作，何正四到北通社根小学任教，罗英、邓筱筠、何世钦到多蕉小学工作，宋家培回到小江工作。县工委派钟高鉴到钦县师范学校，协助黄文楷工作，成立钦县师范学校党小组，在学生中发展沈戈绿、何景星、吴葆颐、黄之才为中共党员，并于12月底建立钦县师范学校第一个党支部，黄文楷任书记。

1940年2月，中共南路特委重建，原属广东省委领导的钦廉四属党组织改由南路特委领导。同时，中共南路特委派黄其江来合浦工作，合浦县工委在白石水金街召开扩大会议，具体布置反逆流斗争。中共南路特委常委温焯华和黄其江以及各区区委书记出席了会议。温焯华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等文件，对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策略。会议确定

反汪反逆流斗争在合浦现阶段的主要内容是：(1)组织团结发动各校师生，开展针对学校实行反共的训育工作、打击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行为进行斗争；(2)组织领导廉州、北海、西场、南康、公馆、白石水、小江、寨圩等地群众开展反对运米资敌的请愿和拦截大米出境的运动，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3)按照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镇压群众抗日活动的行为进行坚决的回击。会议根据合浦县实际情况，布置各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全面的反逆流斗争。会后，合浦县党组织结合学习中共中央1940年2月发出的《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进行了反逆流斗争的部署。4月，张进煊调到广东高州工作，任中共南路特委委员、茂名县工委书记。

5月，根据中共南路特委关于改合浦县工委为合浦中心县委的决定，恢复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组织部长谢王岗，宣传部长朱明。同时，由于日军从钦县、防城登陆，占领了钦邕线，钦廉四属和南宁地区成为敌后区。中共广东省委为了开辟粤桂边抗日游击区，决定建立中共粤桂边工委，以便加强领导，并决定调南路特委书记周南任粤桂边工委书记(未到职)，还调杨甫、余明炎到合浦建立中共粤桂边工委，分别担任粤桂边工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共粤桂边工委机关驻地设在合浦县白沙宏德小学，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管辖钦廉四属和桂东南党组织。

6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隐蔽方针，把一批已暴露的党员调到南路特委另行安排工作，或转移到山区农村以合法职业为掩护，如教师、小商、小贩、医生、工人、农民等，从事地下工作。并进一步调整了各区委领导，中共廉北区委书记改由何达云担任，中共公馆区委书记改由徐永源担任，中共白石水区委书记改由王克担任。合浦中心县委还选派一批党员分别到防城、钦县、灵山等县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作。其中，派罗永瑛(罗森、罗瑛)等6人到灵山建立中共灵山特支，书记为罗永瑛；派庞自、岑月英等12人到国民党钦县南路第九游击司令部的政工队工作，建立中共钦县特支，书记为庞自。

8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山区党组织领导，把中共寨圩特支改建为中共寨圩区委，书记为岑嘉毅。为了加强白石水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决定建立白石水武装大队，大队长张世聪，并建立大队党支部(直属县委领导)，书记为陆新。

1941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日军从钦邕线上撤离的形势变化，决定撤销中共粤桂边工委，钦廉四属党组织仍归南路特委领导。

合浦县委领导机关的恢复和通过党组织的整顿，进一步加强了党在反汪反逆流斗争中的领导力量，为抗击国民党反共逆流的斗争奠定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党组织的整党审干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加强自身建设。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

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战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新党员的数量，进行所谓发展党员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或不经个别的详细审查即吸收为党员，使一些普通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加入了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内。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极为严重的任务，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加强党的团结，并加强党的纪律。决定强调，只有尽一切努力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准备克服目前的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胜利。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达后，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开展了巩固党的工作。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精神，并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有关指示和边区形势，作出了积极参战与支持抗战，团结群众、积蓄力量，巩固抗战阵地，准备应付突然事变；集中力量巩固党的组织、开展自上而下的整党审干，加强党员教育，以及在半年内暂停发展党员等决定。北海地区党组织根据广东省委的部署，为了使全党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经得起政治风浪的严峻考验，保证党组织的隐蔽和安全，于1939年底至1940年进行了抗战爆发后大规模的整党审干，以清理整顿在抗日高潮中迅速扩大的党组织，进一步克服党内存在的、妨碍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贯彻执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纯洁和巩固党的各级组织，迎接更艰苦复杂的斗争。

整党审干以“四查”（查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查入党动机、查入党后的思想意识、查工作表现）、“五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纪律教育、气节教育和秘密工作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审查干部为重点。

整党审干主要是逐级审查干部和党员，重点是审查区委以上主要负责人，确保领导机关的纯洁。根据审查结果，对合格的党员给予登记；需要继续考察的，改为候补党员并规定候补期；有抗日热情但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则秘密放弃，对特嫌及叛变自首分子则秘密开除。

在组织上进行整顿、审查的同时，全面展开了以“五教育”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方法是个别谈话、建立自学制度和举办培训班相结合。学习文件和书籍主要有：中共中央发出的《论当前时局最大危机》、《中国革命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共南路特委制定的《秘密工作条例》等。

整党审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第一，发现并开除了个别内奸、投机分子及蜕化变质分子，处理了一些有严重个人主义或严重违犯纪律分子，清除了党内隐患；第二，放弃了一批仅有抗

日热情但无共产主义觉悟的“同路人”，提高了党的队伍整体素质；第三，严格审查了各级干部，证明县级干部都是忠实、积极的，提拔了一批立场坚定、觉悟较高的新干部，加强了区委一级领导，确保了各级组织掌握在政治可靠的干部手中；第四，使全体干部、党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树立了坚持革命气节、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第五，批判了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等不良倾向，提高了党员的纪律性，加强了团结，提高了秘密工作观念。从而巩固了党的组织，使党员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得到很大增强。

但是，由于整党审干是在战争环境下开展的，整党审干之前中共南路特委以及县工委领导机关均过于强调可能会出现像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样严重的形势，加上北海地区党组织还缺乏整党审干经验，因此出现了做法简单、组织处理偏急偏严的情况，一些基层组织甚至大批秘密放弃党员。

整党审干虽然存在一些偏差，但是基本上达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目的，做好了应付复杂形势的准备，使北海地区党组织以坚强的姿态抗击反共逆流，并战胜了此后接踵而至的困难。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抗日军民发展游击战争，消耗敌力，壮大自己的空间。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敌后战场，不仅使敌人不能稳定地保持其占领地区，而且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配合。然而，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丢失的大片国土，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在华南，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队溃逃，日军占领广九铁路两侧10多座县城。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领导成立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9月，这两支游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战斗在广九铁路两侧和大岭山、阳台山区，创建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发展为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与此同时，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地方组织还在粤中、雷州半岛、潮汕、钦廉等地区组织和起抗日游击武装，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白石水抗日根据地

白石水地处六万山区，合浦、灵山交界处，是北部湾的小后方，森林茂密，地形复杂，是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1938年9月，为了配合日军在华南东线的军事行动，日军驻华南西线部队也对北部湾地区进行了侵犯和骚扰，并占据了涠洲岛。这时，中共合浦特别支部派朱兰清、许家骅、邱鸿就等党员到白石水区，在柑子根小学建立中共白石水柑子根支部，由朱兰清任书记，许家骅任组织委员，邱鸿就任宣传委员。这是白石水区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10月，广州失陷，日军再次封锁涠洲海面，南路形势日益紧张，钦廉地区面临将成为敌后的局面。中共广东省委根据抗战形势的重大变化，需要迅速开辟南路钦廉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及时作出了深入农村、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合浦特别支部派张世聪回白石水工作，并改组中共白石水柑子根支部，由张世聪任书记，朱兰清任组织委员，许家骅任宣传委员。11月，中共西南特委组织部长周楠到北海后主持召开中共合浦特支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指出日军可能随时在广东沿海登陆进犯中国，合浦有沦为敌占区的危险，必须迅速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决定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以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合浦县工委成立后，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加强山区农村党组织的工作，大力发展农村党员，以便开辟南路钦廉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其中，先后派岑月英、罗德崇、李华良、伍雍娴等几名党员到白石水工作，并发展了张世柏、张世瑶、吴之澍、朱菊清、陈玉光等几名党员，还吸收了黄池江、黄家禄、叶梓才等几名农民入党。这时，白石水区的中共党员发展到20多人，为白石水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9年8月，合浦县工委吸取合浦儒家巷事件的教训，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到山区农村，将县工委机关驻地转移到农村，设在合浦县白沙宏德小学；把白石水作为全县山区农村的重点，把小江作为附点，从廉州、北海、西场、小江抽调邱成绩、何若之、罗人迎、刘子明、卢冠群、俞永贞、曾德才、刘舜英、蔡琳、曾国才、岑培祥等一批党员到白石水区工作，加强山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并把中共白石水柑子根支部扩建为中共白石水区委，由李英敏任书记，岑月英任组织委员、邱成绩任宣传委员、张世聪任统战委员，黄池光为委员。白石水区委下辖4个党支部和1个党小组：红岭党支部，书记邱成绩；金街党支部，书记伍雍娴；勾刀水党支部，书记岑月英；柑子根党支部，书记王克；白石水党小组，组长曾德才。调到白石水工作的党员干部绝大部分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都学习过毛泽东的《纪念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以及有关抗日战争的一系列著作，都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他们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许多同志是第一次下乡，第一次接触农民，都能抛弃城市生活，自觉吃苦，虚心接近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

白石水区委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以红岭、金街、东馆、柑子根、茅坪等5间乡村小学为基地，广大党员干部白天在各小学当教师，晚上举办识字班、组织歌咏队，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还利用早晚时间对青年农民进行军事训练。每个党员都有发动群众的具体任务，经常走村串户，跟农民认亲戚交朋友，建立同心会、姐妹会、老人会，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口号和要求。经过约一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发展了40多名贫苦农民入党。这

时，白石水区的中共党员发展到 60 多人，白石水区委下辖的 4 个党支部和 1 个党小组团结组织了数以千计的贫苦农民。白石水区 4 个乡、约 100 个村庄的面貌有很大改变，广大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为白石水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白石水区委也注重统一战线工作，派张世聪、朱兰清做地方绅士以及国民党区乡政府和自卫团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较好成效。朱兰清担任了自卫团旧州大队副队长和旧州乡副乡长，张世聪在白石水民选乡长中，还被选为乡长。白石水区委还对廉州中学总务主任张存芳和一些进步开明绅士做了不少对团结有利的工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使白石水区形成了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封锁中国的对外交通和打通西南通道，牵制其余战场及巩固其占领的据点，在进攻广东沿海一带后，又于 1939 年 11 月 15 日从钦州湾登陆，进攻广西。仅一周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钦县、防城、邕宁、南宁大片土地。在国民党消极抗日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龟缩到广西内地。这时，合浦县实际上已沦为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战争形势使中共白石水区委彻底抛弃对国民党最后一点幻想，更加坚定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放手组织抗日人民武装的方针的决心。因此，白石水区委根据白石水区民间的枪支多、群众勇敢并有作战的经验等优越条件，进行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0 年 2 月，南路特委派温焯华、黄其江到白石水区检查抗日根据地建设工作，并在勾刀水村的东馆小学召开了现场会议，合浦县工委领导及各区委书记参加了会议。温焯华在会上对白石水区建设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5 月，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决定，恢复中共合浦中心县委。6 月，白石水人民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军事“围剿”后，白石水区委书记李英敏调离合浦，合浦中心县委派王克接任白石水区委书记，黄池江任组织委员，卢文任宣传委员，张世聪任统战委员，李辉臣、钟应廷、黄玉昌任委员。8 月，合浦中心县委按照南路特委的指示，为了加强白石水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建立了白石水武装大队，由 200 多名武装农民组成，张世聪担任大队长。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武装大队的领导，武装大队成立了党支部（直属县委领导），由陆新任书记，张世聪、朱兰清、廖尚智任委员，专门领导武装大队和武装斗争。至此，白石水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起来了。

龙潭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9 月，日军占领涠洲岛后，日军舰艇封锁了涠洲海面，烧毁 200 多艘渔船，随时有在北海登陆的可能，所以北海党支部要有打游击战的准备。10 月，广州失陷后，日军舰艇再次封锁涠洲海面，北海不断遭日机轰炸。北海党支部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深入农村、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开展游击战的指示，决定创建北海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中共党员林朗天从福成返回北海，与北海党支部负责人郭芳、卢传义、庞自等商议创建敌后根据地

的有关事宜。经过商议后，北海党支部决定在林朗天的家乡龙潭村创建敌后根据地，合浦县工委统战委员赵世尧也赞同。

龙潭村和周围村庄一样，大多数农民很穷苦，没有小学和私塾，儿童失学，文盲很多。这时，由于日军对北海的轰炸、封锁，使北海昔日繁荣的市场已不存在。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征兵征粮、滥发纸币，使物价不断上涨，市民生活十分困难，沿海渔民、农民的生计更陷入困境，因此北海人民抗日自卫求生存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北海党支部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要将城市抗日救国的工作转向农村，必须把抗日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受到农民的欢迎。而在农村办学，以启蒙教育的办法教育农民是建立农村阵地的好方式。它可以使农民及其子女直接受到党的教育，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获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使党能扎根农村。沿海的渔民、农民受到日军的直接威胁，更具有抗日的积极性和革命性。龙潭村多为贫苦群众，思想比较纯洁，易于提高阶级觉悟，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稳固的农村阵地。于是，北海党支部积极筹划，准备从农村教育入手，扎根农村开展建党的工作和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1月，郭芳以平民小学校长的身份，到龙潭开展农村工作。2月，经过紧张筹备和广泛发动之后，平民小学在龙潭村林氏宗祠开办，学生免费入学，不限年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到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学校平时正常上课，农忙时少上课或放假，不误学生帮助家庭干农活。与此同时，举办成人夜校，动员成人夜间到学校读书、座谈，以便了解农村情况，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革命道理，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为龙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

经过几个月的教育和考察，吸收了陈德藩、林英香、林保章等3人人党。他们都是贫农出身，表现很好，虽因家贫忙于生计，但热心替群众办事，积极工作，成为平民小学的助手，后来成为龙潭抗日联防队的骨干。5月，建立龙潭党小组，组长郭芳。6月，北海特支（北海党支部已于2月扩建为北海特支）为加强开展农村工作，抽调党员王惠澜到平民小学任职，以教员身份出现，协助郭芳开展群众工作和发展党的组织，很快就培养发展了第二批党员：林寿浦、韩瑶晃、张木养、林受权、张冠均、陈心树等6人，并把龙潭党小组扩建为龙潭党支部，书记王惠澜。龙潭党支部分为三个党小组，其中，龙潭上、中、下村编为两个党小组，赤江和横路山村为一个党小组，共有党员10人，为龙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随后，郭芳以更多的时间负责北海特支的工作，北海特支书记赵世尧于8月调离北海后，由郭芳接任特支书记。

这时，沿海一带的渔民、农民最怕日军登陆，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因此群众积极要求组织队伍抗日自卫。龙潭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并组建了龙潭抗日联防队，队长林晃章（民主人士），副队长林英香。抗日联防队共50多人，10多支枪，每3人编为一个小组，轮流到海边放哨，一遇有日军登陆的情况就立即发出信号，这样不但警戒日军入侵，而且防范土匪横行，使群众得以安居乐业。1939年夏，国民党合浦县政府常备中队一个排进驻龙潭，北海特支派陆斐到

龙潭做常备中队的政治工作。不久陆斐调离，龙潭党支部继续做常备中队的政治工作，并发展士兵叶振廷加入共产党。常备中队调走后，龙潭沿海的全部警戒任务均由龙潭抗日联防队担负。至此，龙潭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起来了。

四、抗击反共逆流的斗争

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学校代理人的斗争

合浦一中反杨超兰的斗争。1938年11月，日军飞机炸毁了合浦一中在北海的校舍。1939年2月，合浦一中迁往合浦县城西面、南流江东岸的大石屯村上课。不久，合浦一中校长周胜皋升任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仍兼任一中校长），因此，由学校训育主任杨超兰负责主持合浦一中全面工作。杨超兰思想反动，忠实地秉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意旨，在各种场合大肆散布反共言论，对合浦一中学生的革命行动和抗日爱国活动多方阻挠和打击。学生们在学校周围的畔塘、窖口、九坡等村开展抗日宣传、办农民识字班等活动，都受到杨超兰的种种限制，动不动就以旷课论处。训斥到社会进行抗日宣传的学生是“野马”、“不务正业”、“上了共产党的当”。杨超兰不准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把阅读进步书刊的学生判作“思想赤化、不堪造就”，把具有高度觉醒的抗日爱国学生诬蔑为“蒙面之马”，即被人蒙蔽，受人主使，就像磨盘边被蒙上眼睛的马被人赶着转一样。杨超兰还专门收买、培育一些思想反动、品质不良的人充当其走狗，专门在学生中搞跟踪、密报等特务勾当，对一批思想进步、品学兼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学生进行监视、打击，甚至勒令退学，剥夺读书学习的权利。7月，学期结束时，杨超兰就以“思想赤化”的罪名强迫卢文、伍朝汉、仇乃梁、何坤、廖元睿等10名学生退学。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加强对合浦一中进步学生的控制。杨超兰经常在学生中散布对抗日悲观失败的论调，说什么“日本很强，我们很弱，抗日的结果很难预料”；谩骂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奸党”，攻击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危害国家”，造谣中伤，破坏团结；宣传一党专政，实行特务统治，抵制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

杨超兰由于在合浦一中实行法西斯统治，已成为学校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严重障碍，其言论和行动实际上对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起到了破坏作用，与汉奸汪精卫唱同一调子，是名副其实的“汪派汉奸”。合浦中心县委负责人密切注视着杨超兰掀起的反共逆流，关心合浦一中全体师生的前途和命运。1940年4月，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组织部长谢王岗召集合浦一中党支部成员罗永莹、谭俊、邓爱莲开会，研究和布置开展反杨超兰的斗争。与会者一致认为，根据杨超兰长期以来的言行表现，他实际上已起着同汪派分子一样的作用。为了扫除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障碍，必须开展反杨超兰的斗争，揭露他的反动面目，以推动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开展。会议指出：(1)开展反杨超兰斗争是反汪反逆流斗争的一部分；(2)在群众中揭露杨超兰投降顽固派的面目；(3)赶走杨超兰。

5月上旬，杨超兰在高三班上课时，公然指责迁校小江镇的廉州中学学生支持当地群众反

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是“越轨行为，受人利用”，并警告合浦一中学生不得仿效。这时，合浦一中党支部成员、学生会副主席谭俊实在是忍无可忍，站起来阐明廉中学生支援群众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是爱国的正义行为，不是越轨或受人利用，并指出杨超兰在挑拨一中学生与廉中学生的关系，破坏团结。谭俊的发言得到了同班同学的积极响应，学生吕剑平等纷纷站起来揭露杨超兰阻挠学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监视、打击爱国进步学生，大搞特务活动的罪恶行为。杨超兰恼羞成怒，课还未上完就急忙溜走了，并打电话到县政府求救，诬告学生造反，要求调军警前来镇压学生，从而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高三班学生批驳、揭露杨超兰罪行的斗争震动了全校，在合浦一中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其余各班级的学生也纷纷起来揭发、声讨杨超兰的罪行，反杨超兰的斗争在全校范围内迅速展开。

为了镇压学生们的反杨超兰斗争，学校当局立即宣布开除谭俊和罗永莹的学籍。但反杨超兰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被镇压下去，学生们推选 20 多名代表前去向周胜皋请愿，要求撤销对罗永莹、谭俊的处分，撤换杨超兰，而周胜皋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正义要求。于是，合浦一中党支部继续组织领导学生坚持斗争，并大量印刷揭露杨超兰罪行的传单《打倒制造纠纷，挑拨离间，迫害进步学生的汪派汉奸杨超兰》，向社会广泛散发（除了向合浦县城、北海散发外，还组织学生到小江、寨圩、公馆、南康等地散发）。全县各中学也纷纷召开大会，声援合浦一中反汪反逆流斗争的行动。这时，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行政专员邓世增和合浦县县长李本清对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惊恐万分，亲自带领大批军警包围合浦一中，迫令全校学生集中在广场，对学生们进行训话。邓世增在训话中先是威胁、后是“劝导”，告诫学生们要“安分守己”（意思是不要搞抗日救国活动），“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接着，又假装十分痛心的样子说，邓家出了个邓爱莲（邓世增的侄女，是这次反杨超兰斗争的领导者之一）是个大不幸。并要邓爱莲站出来当众认错。但邓爱莲早已识破邓世增这一套阴谋手法，拒绝参加这次“训话”会，使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不得逞。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尽快将反杨超兰斗争镇压下去，于 6 月初便举行学年考试，提前一个月放暑假。但在整个暑假期间，仍有许多学生留校坚持斗争。后来，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加强对合浦一中的统治，便于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迫令合浦一中迁往合浦县城附近的平田。但在那里，抗日爱国学生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与此同时，设在公馆的合浦五中掀起了反林宝鸿的斗争，合浦县立寨圩简易师范（简称寨圩简师）开展了反梁宝雅的战斗。

合浦五中反林宝鸿的斗争。1940 年春，国民党合浦县当局为了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任命国民党顽固分子林宝鸿、赖功奏、廖斌秀分别为合浦五中校长、教导主任、附小主任，他们对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和进步表现恨之入骨，经常公开指责学生“不学习功课，看什么马克思、牛克思的书”，诽谤要求抗日追求进步的学生是“害群之马”、“危险分子”，并无时不在寻找机会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3 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思想反动的体育教师在上课时无理训斥学

生，学生陈元义、陈澍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反驳了几句，林宝鸿、赖功奏竟不问情由便给陈元义、陈澍益各记大过一次，想以“杀鸡儆猴”的办法震慑学生，扼杀学生的进步活动。这种做法把学生激怒了，学生们选派代表找林宝鸿、赖功奏讲理，但林宝鸿、赖功奏理屈词穷，置之不理。因此，学生更加愤怒，准备进一步开展反林宝鸿斗争。恰好此时，合浦五中党支部接受了合浦中心县委布置秘密散发八路军通电《告全国人民书》的任务，并组织学生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传单发遍公馆圩镇及附近农村。国民党公馆区区长林作周和林宝鸿、赖功奏等大为恐慌，认定这是共产党有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并怀疑这次活动与合浦五中的学生有关。于是，学校当局与区长林作周和顽固分子张枚新等勾结起来，派出军警突击搜查进步学生的宿舍和设在圩上的“统一书社”等处，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学生党员在公馆区委的领导下，带领学生代表责问学校当局为何非法搜查学生宿舍？并痛斥他们的无耻行为，揭露他们破坏抗战，迫害学生，倒行逆施的丑恶嘴脸。林作周、林宝鸿等恼羞成怒，便派大批军警到合浦五中戒严，并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开除了陈铭金等8名学生的学籍（其中6名学生是中共党员）。合浦五中党支部立即发动学生一致起来抗争，限令学校当局在3天之内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并承认错误，否则便举行全校罢课。但学校当局坚持错误，到期仍无答复，于是全校学生开始罢课。罢课开始后，学校当局又开除了陈科龙等6名学生的学籍，对赖祖辉等2名学生记大过处分，这样斗争就更加尖锐了。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罢课学生成立了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罢课斗争。罢课学生几次印发告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学生家长书，并分别走访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有声望的学生家长，阐明事实真相，揭露林宝鸿、赖功奏等镇压抗日救国运动、诬陷学生、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提出撤销林宝鸿和赖功奏的职务、恢复所有被开除学生的学籍、今后不得诬陷学生等要求。罢课持续了10多天后，在群众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学校当局被迫召开校董会，同意恢复所有被开除学生的学籍。这次反林宝鸿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充分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丑恶嘴脸，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团结教育了全体学生，更重要的是锻炼提高了党员的斗争意志。

寨圩简师反梁宝雅的斗争。1940年春，中共寨圩特支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后来被国民党寨圩当局镇压下去了，简师校长陈业昌、教导主任卢壁光被迫离开了学校。1940年秋，国民党寨圩当局为了进一步限制进步师生的活动，委任思想反动的梁宝雅为简师校长。梁宝雅到简师后，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擅自制定了限制师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规定，明令学生不得开展反汪斗争，不准结社外出，不准阅读进步书报，连当时公开发行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也明令禁止阅读。梁宝雅还与学生中三青团骨干、特务分子等勾结在一起，加强对进步学生的监视和控制；并在学校经费管理委员会（简称经委会）上提出，在校生都要经过再考试，不合格的要勒令退学，企图以成绩差为借口开除一批进步学生，还可以加大学生的功课负担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但由于经委会大多数成员都不同意梁宝雅的意见，致使其企图没得逞。11月，梁宝雅又勾结寨圩区区长罗光烈，两次派军警到简师

要逮捕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学生自治会主席蒙英翰，但由于学生们坚持与梁宝雅、罗光烈作斗争，并组织学生到街道、农村揭露罗光烈贪污腐败以及带兵包围学校，逮捕学生等罪行，使广大群众议论纷纷，到处都说这个贪污区长，不但贪污了商家和老百姓的钱，连学生也不放过。因此，在群众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梁宝雅、罗光烈看到形势不妙，便收兵撤出简师。梁宝雅的丑恶面目，令师生倍加憎恶，因此简师党支部决定开展驱赶梁宝雅的罢课斗争。罢课开始后，许多学生纷纷下到农村，动员民众起来抗日，并揭露梁宝雅执行反共倒退路线，在学校公开镇压学生抗日活动，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简师的优良传统等罪恶行为，坚决要把梁宝雅赶出简师。罢课斗争坚持了三个月，至1941年3月，县长李本清亲自到简师处理学潮事件，并根据梁宝雅暗中列出的在简师“闹事”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名单，宣布开除16名学生的学籍，同时下令通缉已离校的学生蒙英翰、蒙英经等。于是，这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先后转入地下，开展新的反逆流斗争。这次反梁宝雅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团结教育了全体学生，锻炼和提高了党员的斗争意志，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逆流热情。

此外，廉州中学、合浦三中（今南康中学）也都先后开展了反逆流斗争。已迁校到小江的廉州中学师生深入山区农村，通过办夜校、演戏等方式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发动和领导了小江区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合浦三中党支部利用各种纪念日，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五四青年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组织学生在学校召开纪念会、游艺会、讨论会，在学校里或到街道、农村出墙报、画漫画、写标语、演戏、唱歌等，特别是于1940年5月30日召开了“南康各界纪念五卅惨案大会”。通过这些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处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以及汪派汉奸卖国投敌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为，号召群众抗日救国，使抗战思想深入人心，激发群众对日寇、汉奸卖国贼的仇恨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义愤。

由合浦中心县委发动各校学生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学校代理人的斗争，是反逆流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各地群众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互相配合，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狠狠打击投降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且显示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为后来领导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

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后勤供应日益困难。于是，日本侵略者大肆劫掠占领区的资财，通过汉奸和奸商从国民党统治区高价抢购大米、桐油、铜元等战略物资，以补充日军的给养。涠洲岛、海南岛于1938年9月、1939年2月相继被日军侵占后，由于北海地处北部湾畔，接近涠洲岛、海南岛沦陷区，于是1939年初，北海便有奸商通过海上运输将物资运到涠洲岛或海南岛资助敌人。到1939年11

月，日军从钦县登陆，占领了钦廉四属地区的钦县、防城、灵山及桂南地区的南宁、邕宁、横县之后，奸商运输物资到日军占领区资敌活动更为猖獗，一些地方官僚见有利可图，就不顾民族存亡和人民的死活，勾结奸商、汉奸抢购大米资敌，大发国难财。特别是在1940年初的青黄不接季节，这些民族败类在各乡镇大肆高价抢购大米资敌，引起北海地区米价暴涨，每筒米（旧称约10两）由1角7分涨至7角左右，许多群众因此断炊挨饿，甚至饿死。广大民众对哄抬米价的官僚、奸商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反对奸商运米资敌，平抑米价，保护人民利益。南路特委和合浦县工委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领导北海地区人民普遍开展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史称“合浦米案事件”。斗争的口号是：“反对汪派汉奸卖国贼运米资敌！”“反对民族败类运米资敌的卖国行为！”斗争的方式是：(1) 召开大规模的反对运米资敌斗争大会及组织群众请愿，揭发、抗议民族败类运米资敌的卖国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制止运米资敌行为，惩办资敌卖国的民族败类；(2) 组织群众到各圩场阻止民族败类抢购大米，把已高价抢购的大米拿到圩场上平价出售；(3) 组织群众将中途拦截奸商外运的大米，也拿到圩场上平价出售。反对奸商运米资敌斗争的普遍开展，使北海地区的抗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

南康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39年5月，南康的一个圩日，市场米价一天数变，霎时被抢购一空。经调查才知道是合浦自卫大队队长陈均仁勾结奸商李仲谦高价抢购，群众揭发后，国民党一七五师驻军从白沙头拦回李仲谦即将启运的两船大米。南康青抗队等救亡团体和一七五师政治部青年指导员叶乃沃当即发动数千群众向镇公所请愿，要求惩办奸商，没收大米。几天后，邓世增到南康调解。邓世增在群众大会上为奸商辩护，受到群众驳斥，逼得慌忙躲进合浦三中，愤怒的群众又涌至合浦三中示威请愿。邓世增为了脱身，采取欺骗手段，假意答允惩办奸商和没收大米。随后，邓世增将李仲谦“押”回廉州释放，并将大米还给奸商。这是一场群众自发的反运米资敌的斗争，也是合浦米案事件的前奏。

多蕉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39年秋，合浦工委派罗永瑛到多蕉乡中心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不久，中共党员罗永瑛、何世钦、邓家贞建立了多蕉乡第一个党支部，罗永瑛任支书，后来发展黄祚利（黄平）等入党。中共多蕉乡党支部在师生和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广泛团结教育群众，还派党员和进步教师及党所培养的对象参加乡公所的武装集结队，并成为该队的骨干。1939年冬，钦县、南宁相继被日军占领，多蕉是合浦县东北通往钦县的要道，常有奸商偷运大米、桐油、铜元等物资经过多蕉运往钦县资敌。于是，多蕉乡党支部通过武装集结队查缉通敌的卖国奸商。

一天晚上，根据撑渡老汉的通报，武装集结队在党员的带领下早就守候在多蕉渡口的对岸。当晚10时许，果然有几个人领着10多担货乘竹排过河，等他们上岸后，武装集结队马上包围他们，进行搜查，结果查出是桐油、铜元、鸦片等物资。那几个带领挑夫的家伙立即凶相毕露，拔出短枪来威吓。但武装集结队毫不示弱，向他们发出警告。因此，他们不敢嚣张，武装集结队便将这批货物扣留起来。国民党多蕉乡公所得知情况后，由副乡长出面为奸商辩护，说这批

货物有特殊通行证，应该放行，并责备武装集结队干预政府的事，声言要解散武装集结队。随后，武装集结队向乡公所请愿，要求乡公所依法制裁卖国奸商，结果又遭到乡长的拒绝，乡公所强行将这批货物放行，将奸商放走。请愿群众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表示对反动乡长的抗议。斗争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它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人民更加看清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卖国的丑恶面目。

沙岗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39年2月，西场党组织派党员王克等到沙岗小学以教书的合法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6月，建立沙岗乡第一个党支部，王克任支书。中共沙岗乡党支部通过办夜校，组织剧团、宣传队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派党员王益参加国民党沙岗自卫大队任中队长。1939年冬，日军从钦县、防城登陆后，奸商运大米、桐油、铜元资敌的活动非常猖狂。沙岗自卫大队队长王国光竟然勾结奸商杨秀甫在沙岗抢购大米，外运资敌。一天，恰好杨秀甫外运资敌的一批大米、桐油被沙岗抗敌后援会缉获。沙岗乡党支部立即发动学生及其他群众数百人举行反汪、反运米资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运米资敌”、“打倒王国光、杨秀甫大汉奸”等口号。接着，派20多名青年到廉州，同西场青抗会代表、廉州战地服务团和北海学生队等100多人，联合向国民党合浦县政府请愿，提出“惩办汉奸王国光、杨秀甫”、“禁止运米资敌”等要求。县政府秘书王佐彝用“等候研究处理”等含糊词语搪塞，欺骗群众。

请愿代表回到沙岗后，王国光恼羞成怒，在国民党合浦自卫团第三支队队长陈南的授意下，逮捕了请愿的吴华英、莫宝库、曾纪绰、曾纪钦、莫鼎钦、符佳、顾际聪、顾际顺、苏树峰等10多名代表，翌日将他们押送廉州。沙岗乡党支部为提防王国光在途中暗杀这些青年，通过王益安排几个班长暗中保护。这些代表被押至廉州时，个个挺胸昂首高歌：“打倒日本，除汉奸！”沿途出来观看的群众十分惊奇，议论纷纷：“抗日救亡，也有罪吗？”“难道反对奸商汉奸运米资敌也错吗？”到合浦县政府后，县政府迫于舆论不敢受理，于是把被捕的教师、学生退回沙岗关禁处理。后来，沙岗乡党支部发动当地上层人士出面交涉，王国光不得不释放被扣押的代表。

廉州大请愿。1940年2月，合浦县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在北海地区开展反汪反逆流的斗争，并根据群众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迫切要求，把这一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以合浦米案事件为突破口，在现有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和反汪反逆流的斗争。会后，合浦县工委决定，由中共廉北区委和中共西场区委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大请愿，揭发国民党顽固派与汪派、汉奸、奸商勾结资敌的罪恶行径。这次请愿运动指定由廉北区委书记庞达负责全面领导。庞达指派王克、郭芳、张家保、罗永莹、庞自等7人组成临时党团，秘密负责请愿现场的领导，王克为党团书记。同时，为了有利于对付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和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选定由邓爱莲（邓世增的侄女）、李梓明（北海学生队队长）公开出面带领群众开展斗争。

庞达在临时党团成立时传达了合浦县工委的指示：这次请愿运动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揭露和谴责国民党顽固派与汪派、汉奸、奸商勾结，政治上破坏和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监视进步学生，查封抗日救亡团体，准备投降；经济上运米、桐油、铜元等战略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丧心病狂甘当汉奸。要求国民党合浦县政府必须制止这种卖国殃民的罪恶行为。在请愿斗争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做到因势利导，把这场请愿运动形成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斗争的高潮，以便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三个“坚持”的信心，并当众用事实和行动警告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倒行逆施是不得民心的。

经过短短几天的紧急发动，沙岗、西场、石康、南康、廉州、北海等地党组织共组织群众2000多人，于2月11日上午9时左右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廉州东山寺（国民党合浦县政府所在地），把县政府围得水泄不通。“禁止运米资敌”、“反对囤积居奇”、“平抑米价，保护人民利益”、“反对贪污舞弊！反对抓丁拉夫”、“反对借名抗战，大发国难财”等口号声此起彼落，吓得县政府的官吏惊慌失措，把大门紧闭。群众要求县长李本清出来答话，但他怕得要死，龟缩衙内，不敢露面。邓爱莲和李梓明便在县政府门前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用沙岗、西场、南康、多蕉等地最近发生的奸商运米资敌事实，控诉奸商运米资敌的卖国罪行，揭露国民党官吏贪污舞弊等罪恶。庞自草拟了《反对运米资敌，反对逆流的请愿书》及写了一篇简短有力的传单散发给民众，进行宣传鼓动。至下午4时，县政府还不派人接见，群众纷纷要求第二天再来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晚上，临时党团召开会议。会上，王克向庞达汇报了请愿情况。庞达指出：据反映今天请愿对廉州城内外震动很大，民众基本上都赞成这次反对运米资敌的行动。会议对第二天的请愿运动作了具体安排。

第二天，请愿人数更多，约3000人，将县政府团团围住，既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又高呼“我们请愿书上提的禁止运米资敌，请县长答复”、“我们要求惩办运米资敌的奸商，请县长答复”等口号。李本清眼看赖不了账，便派县政府秘书王佐彝出来接见群众。但王佐彝在讲话中避而不谈请愿代表提出的要求。群众十分恼怒，爆发一阵阵“滚回去！滚回去”“要李本清亲自出来”的喊声，王佐彝便灰溜溜地退回关上大门。这时，请愿的群众非常气愤，有些人主张撞开大门冲进去，但请愿队伍指挥部的同志想到斗争要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说服大家冷静再想想办法。不久，王佐彝又叫人打开大门，提审犯人，审判厅里站着的警察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妄图以此威吓群众。但群众并没有被吓倒，群情更为激愤，有些人主张立即冲进去跟王佐彝辩论。但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指挥部的同志要求大家不要冒险冲进去，并决定各个队伍就地以地区为单位集中起来，宣传员对群众演讲，进一步揭穿国民党顽固派搞逆流的反动实质。随后，指挥部研究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吩咐大家准备好明天的斗争。

第三天，请愿的群众又比第二天几乎增多了一倍，口号声一浪比一浪高：“要李本清出来见面！”“要李本清出来回话！”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李本清被迫战战兢兢地爬上了矮墙头，

面对着愤怒的群众答话。他答允压低米价，并查办运米资敌的奸商，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场斗争，是北海地区党组织所领导的规模较大的群众运动，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力量的一次大检阅；通过斗争，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使群众增强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信心。

请愿后不久，国民党南路行署主任罗翼群到合浦。廉北区委获悉后，组织队伍前往罗翼群住处“德国楼”（今合浦还珠宾馆内）请愿。当天凌晨4时，合浦战地服务团40多人，冒着彻骨寒风，涌到“德国楼”前，高呼口号，把罗翼群从梦中惊醒。罗翼群起初不肯出来接见，但群众一直坚持斗争了几个钟头，弄得他走又走不得，留又不安然，上午8时才被迫出来接见，代表向他提出“压低米价，改善人民生活，严惩运米资敌的奸商”等要求，罗翼群都答允了。而这是李本清、罗翼群等欺骗群众的退兵之计。请愿队伍撤退后，李本清、罗翼群等仍然纵容、支持奸商运米资敌，甚至进一步出兵镇压各地反运米资敌的群众。这就在广大群众面前充分暴露他们的顽固反动本质，使群众更认清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西场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40年4月，国民党合浦自卫团第三支队长陈南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不理睬西场青抗会的抗议，每逢圩日便派人在西场高价抢购大米，运往海外资敌，群众买不到米，激起民愤。在合浦工委的领导下，西场的共产党员朱明、罗刚、黄模、劳锦、包恭、王贵德、陈家熙、庞殿勋、石起、罗人迎、张启泰、梁国珍、庞玉全、黄人彩、叶崇业等组织发动群众，由国民党西场区分部（共产党员石起任区分部书记）和西场青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出面召开西场各界反汪救国大会。

4月8日（正逢圩日），西场牛圩坡挂出“西场各界反汪救国大会”的横额。上午10时许，当群众纷纷来赶集的时候，西场青抗会会员集队敲锣打鼓绕市游行，高呼口号，群众知道召开反汪大会，纷纷赶赴牛圩坡会场，很快就集合了2000多人。会场上歌声、口号声震耳欲聋。大会由国民党西场区分部书记石起及青抗会负责人陈家熙、王贵德主持。西场镇副镇长莫由均为了监视群众，也出席了大会。陈南还派中队长黄毅带领全副武装的自卫队，恶意地在会场巡逻。王贵德首先在会上讲话，他指出：自日军侵占濠洲，又在龙门、企沙登陆钦防后，魔爪已伸到合浦，汪派汉奸活动更加猖狂。汉奸就好像“为虎作伥”的伥鬼，帮助老虎去害人，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伥鬼”！现在西场有人勾结汉奸收购大米、铜元资敌，这不是“伥鬼”是什么？台下的群众听到这里，迸发出一阵阵“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呼喊声。接着莫由均上台讲话，他否认有人运米资敌。黄文模、张启泰、罗人迎立即同他辩论，指出奸商从西场大风江将几船米外运出海的事实，讲述群众没有米吃的苦楚，他们边讲边流下悲愤的眼泪。莫由均十分尴尬，台下青年农民洪利勇愤怒质问莫由均：“你们当官的只会捉征兵，不知压低米价、不捉汉奸，群众没米吃，难道叫大家去做贼、当汉奸？”莫由均马上断章取义，诬说洪利勇煽动群众去“做贼当汉奸”，下令自卫队捆绑洪利勇。与会群众对此义愤填膺，大家振臂高呼：“不准逮捕爱国人民！”“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洪利勇被押回西场镇公所后，群众涌向镇公所请愿，街道被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请愿群众向西场镇公所提出六项要求：（1）禁止运米资敌；（2）禁止

抬高米价；(3)严惩陈南，逮捕汉奸洪元盛、王国光；(4)不准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准许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5)不准逮捕爱国人民，无条件释放洪利勇；(6)要求政府致电七区（以高州为中心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七行政区）无条件释放爱国青年周崇和、文允武等。与此同时，罗刚、罗人迎、张启泰、吴济棠、卢善辉、陈录纪、陈家熙、黄幼茜、梁国珍、庞玉全、廖慧明、钟少华等轮流向圩镇的群众演讲，控诉陈南、黄由均等破坏反汪运动的罪行。请愿群众，情绪激昂，互相鼓励，坚持请愿。到了晚上，点着汽灯，唱歌、演讲、喊口号，通宵达旦。请愿持续了两个昼夜。

在请愿过程中，陈南等进一步采用高压手段，逮捕了正在演讲和贴标语的学生陈国强和文经；在西场广州会馆面前逮捕了正在演讲的庞殿勋，开枪威吓群众。陈南不顾群众的强烈抗议，将被捕的洪利勇、陈国强、文经和庞殿勋押送廉州。群众面对陈南一伙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中共西场区委又组织队伍赴廉州请愿。各党支部及党小组在圩镇和农村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请愿队伍，募捐大米、薯干等，组成了以党员及青抗会员为骨干的包括教师、学生、农民、小贩等约500人的队伍，步行赴廉州请愿。由朱明带队，一路唱歌喊口号，浩浩荡荡，斗志十分旺盛。请愿队伍到总江渡口时，天已黄昏，迁校至大石屯的合浦一中部分师生闻讯赶来迎接，表示坚决支持西场人民的正义斗争，激励了大家的斗志。请愿队伍进入廉州后，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假意接待，安排圈套。把请愿群众分散在钟鼓楼、孔庙、朱赢小学等3个地方“住宿”。当夜全城戒严，不准请愿群众出入。第二天下午，反动军警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威迫请愿群众，逐个搜身后，驱赶出城。当场逮捕了罗刚、陈家熙、罗人迎、吴济棠、詹日才、裴凤芝等。不少请愿群众同驱赶他们的反动军警争辩，申明请愿的愿由，控诉陈南运米资敌的罪行。当天晚上，请愿队伍回到白沙江时，有一个化名为无忧九的来报信，说陈南派黄毅带一个中队守在路上，准备开枪射击请愿群众。请愿群众只好在一间祠堂里住宿，第二天早上才返回西场。随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疯狂地镇压西场爱国人民，解散西场青抗会，撤销黄模、庞玉全、石起等的校长职务。还先后逮捕了与米案斗争有牵连的张启泰、卢善辉、黄文模等。

西场区委为了建立秘密联络点，派庞玉全建立合新绣花店。在店里工作的有庞玉全、廖慧明、陆华英、钟少华、黄革等女同志，她们发动30多名妇女投了股金，购回一批布匹、丝线等原料，以刺绣枕面、床眉等工艺品作掩护，从事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她们对被捕入狱的同志怀着深厚的阶级友情，曾几次用挣来的手工钱购买食品，慰问狱中同志。不久，合新绣花店又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一个晚上，陈南带兵来查封合新绣花店，逮捕了庞玉全、廖慧明。至此，西场反汪斗争中共被捕了15人，其中共产党员11人（罗刚、庞殿勋、陈家熙、罗人迎、詹日才、裴凤芝、吴济棠、张启泰、庞玉全、廖慧明、陈国强）。他们全被关禁在廉州监狱。罗刚重视做狱中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设法弄来一些进步书籍给同志们传阅，还做狱卒的思想工作。半年后，国民党将15人一起宣判，分别判处1年6个月、2年6个月、3年的徒刑。罗刚严词驳斥审判官，当场撕毁了判决书。狱中同志一直保持革命气节，坚持斗争。

西场反运米资敌的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西场人民的爱国热情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促使人民进一步觉醒，深刻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倒退、反共的反动面目，在西场地下党的领导下转入了新的斗争。

小江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40年3月，中共小江区委根据合浦工委的部署，计划在小江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汪反逆流的斗争，并根据群众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迫切要求，决定开展以反运米资敌为中心的反汪反逆流的斗争。首先在群众中做宣传发动工作。廉州中学（于1939年3月迁校到小江）的党员及农村的党员，分别在小江附近的塘埇角、北河坡、洞心、那白岭、头山、西塘等村庄，通过举办民众夜校向农民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方针，揭露官僚、地主勾结奸商运米资敌的卖国罪行。每逢小江圩日，廉州中学学生到街头进行宣传，讲抗战形势，指出米价暴涨，人民生活濒临绝境的原因是奸商运米资敌，从而激起群众对奸商、汉奸的仇恨。经过一番宣传发动后，小江区委决定于5月1日（小江圩日）在小江圩粮食市场召开群众大会。为了不使党员暴露，拟定推选塘埇角村较有名望的非党人士陈达才和该村小学校长陈仕舟（陈时洲）主持大会。并决定会后组织群众到乡公所请愿和到南流江边拦截准备运出去的粮食。

5月1日上午9时左右，各地群众以赶集的形式陆续来到小江圩粮食市场，共有2000多人参加大会。由陈仕舟宣布召开反对运米资敌群众大会，由陈达才主持大会并发表了讲话。陈达才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揭露奸商勾结汉奸抢购大米外运资敌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奸商运米资敌。与此同时，会场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倒汪派汉奸”、“反对合浦县国民党官僚和奸商勾结运米资敌”、“反对支援日寇的卖国投降行为”等口号声此起彼伏，群众情绪非常高涨。随后由陈仕舟提议，到乡公所请愿，要求禁止抬价抢购粮食外运资敌。大会推选宋家培、宁章毅、黄善瑶、陈剑威、陈毓彬、谢伯寿、黄春林、黄子兴等为请愿代表，带领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往小江乡公所请愿。请愿群众举着五色纸旗，赶着一头大水牛，在牛的身上两边用石灰水分别写上“打倒宋赞乾”“打倒日本鬼”两条标语。群众队伍到乡公所后在门前站着，宋家培等八位请愿代表进入乡公所，要求乡长宋赞乾（宋寿伯）出来答话，但宋赞乾不在乡公所，副乡长王廷英出来见请愿代表，十分惶恐。请愿代表揭露了小江乡乡长宋赞乾运米资敌、贪污勒索的罪行，并向王廷英提出要求：（1）不准奸商抢购大米，禁止奸商运米资敌；（2）减轻征粮、征税数目；（3）撤销目前征收的拆城费（拆廉州城每人摊派费用3.6元）和公民证费（每人0.2元）等苛捐杂税。王廷英在群众强大压力下，被迫答应了上述的要求。请愿代表从乡公所出来，向群众宣布副乡长答应群众的要求后，群众队伍便到小江镇旁边的南流江卡截用竹筏载运的大米，不准外运，并动手封存奸商囤积的粮食。奸商慑于群众威力，不敢继续抢购粮食并停止运粮出口，于是粮价立即下降，由每筒米4角左右降至1角左右。

小江群众反运米资敌的斗争，使合浦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小江乡乡长宋赞乾电告国

国民党合浦县政府，诬蔑小江的群众聚众暴乱，包围乡公所，强迫副乡长答应群众的要求；为首组织群众的是廉州中学的学生。为此，合浦县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出兵武装镇压，便派合浦县自卫大队队长王猷远率一个自卫中队到小江乡镇压爱国群众。5月14日早上，自卫队突然包围了塘埔角村，但自卫队没有捉到共产党员，也没有搜查出什么重要的材料，只逮捕了在群众大会上被推选担任大会主席的陈达才和陈仕舟两人，带回小江圩关押在乡公所。这时，小江区委书记李秋和廉州中学的党员罗南煜、陈冠庸、卢文、王琼儒等正在麓表湖村，闻知国民党军队包围塘埔角村后，他们都离开麓表湖村撤退到该村东面的大山上。当天，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正好也到达小江，李秋向黄其江汇报了小江各方面的情况后，两人商议应付当前局面的办法。黄其江指出，当前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压境，群众没有武装，也没有武装斗争的准备，没有力量实行武装抵抗，唯有迅速通知各村庄撤退已暴露人员，避免被逮捕；已被捕的两人都是非党的中间人士，国民党抓不到他们什么把柄，可以通过地方中间和进步力量，担保他们出来。黄其江还派陈冠庸、卢文、王琼儒和进步学生曾日慧到广州湾向中共南路特委汇报小江米案的情况。随后，黄其江接到国民党要出兵镇压白石水的情报，便匆匆赶去白石水了。于是，李秋立即召集宋家培、伍雍谊和廉州中学的几个党员在南流江东面的大山中开会，就当前的事态研究对策。会议决定：(1)密切注视自卫队的行动；(2)通过一个在小江乡公所做乡警的地下党员了解陈仕舟、陈达才被捕后的情况，谋求保释的办法；(3)通过党员向群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罪行；(4)党员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以免遭受损失；(5)派与王猷远有宗族或亲戚关系的学生党员和进步学生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制止自卫队扩大镇压的行为。

5月15日，自卫队又包围了廉州中学，要逮捕廉中参加群众大会及请愿的学生。而廉中校内的学生党员林富山等知道自卫队包围塘埔角村捕人的情况，事前已有警惕，发现自卫队前来，立即把校门关起来，并动员同学们一起护校。有一个配备武装的校警是共产党员，加上少数护校学生带有手枪，他们作了在必要时以武装护校的准备。在自卫队和护校学生对峙时，学生们高呼“保卫廉中”、“反对干涉学校的自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包庇、支持奸商运米资敌”等口号。这时，廉中校长蔡振玮以及进步教师韩朗周（教导主任）、张存芳（训育主任）等出面和自卫队的负责人交涉。自卫队的负责人说廉中有学生组织农民暴乱，奉命搜捕这些学生。蔡振玮等则说，学校并无参与农民禁止运米的行为，学校是教学的地方，不能在学校范围内捕人。个别学生在校外的行为，应在校外搜捕，自卫队不能进入学校。为了维护学校的安全和学生的正常学习，请撤除对学校的包围。在学生的严阵以待、强烈反对和学校的严正交涉下，双方坚持了几个小时后，包围学校的自卫队只好撤走了。后来，廉州中学被迫迁回廉州举行期终考试。

自卫队包围廉州中学遭到失败之后，便连续几天在小江圩周围的村庄或山区进行搜捕，其目的是捕捉共产党员。由于小江区委采取了预防措施，所有党员都注意隐蔽，所以自卫队始终抓不到共产党员。小江区委又派与王猷远同族的党员王瑶儒和进步女士王碧云以及跟王猷远相

识的党员易志贤，做王猷远的思想工作及自卫队的瓦解工作。王瑶儒等找王猷远谈话，指出自卫队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行为是错误的，小江的农民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只是由于米价飞涨、生活困难，被迫起来向乡公所请愿，得到乡公所的同意后才到南流江边拦截准备出口的大米，制止运米资敌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并不是什么“暴乱”；而镇压群众运动是帮助了日军、奸商和贪官污吏，站到爱国人士和群众的对立面。王瑶儒的母亲是王猷远的长辈，她见到王猷远时也责问他：为什么要带自卫队围攻学校？为什么要逮捕没有犯法的群众？经过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并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王猷远的态度稍有变化，不像初来时那样疯狂猖獗，而出现敷衍差事的态度。之后，王猷远带着自卫队在小江圩周围的村庄和山头转悠了几天，便带领自卫队溜回合浦县城了。

陈冠庸一行到广州湾向中共南路特委汇报了小江群众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情况，在遂溪、雷州的学校和农村中宣传了小江农民的斗争精神，揭露了合浦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群众爱国民主运动、帮助奸商运米资敌的罪行，并在1940年广州湾出版的《青年导报》第一卷第三册上用洛克的署名发表了《汪派汉奸怎样镇压合浦小江的反汪运动》一文。被逮捕关押的陈达才和陈仕舟两人，本来不是共产党员，除了在群众大会上被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行动，国民党政府拿不出什么可能给他们定罪的事实。因此，陈达才和陈仕舟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小江区委积极找人担保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就让取保释放了。

至此，小江区人民群众反汪、反逆流、反运米资敌的斗争暂告结束。这次斗争表现了小江人民群众的初步觉醒，小江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获得了经验教训，特别是认识到武装力量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为人民革命事业在小江区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白石水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40年初，中共白石水区委根据合浦县工委关于反汪反逆流的指示，首先由白石水区委统战委员张世聪发动群众，联名控告白石水乡乡长梁文光和旧州乡乡长吴质平借“抗战”之名，进行征兵勒索、贪污舞弊、横行霸道等罪行，迫使国民党合浦县政府将这两人撤职，还实行民选乡长，选举开明绅士韦六吉为白石水乡乡长，朱兰清为旧州乡副乡长。但是，梁文光拒不交权，还与县长李本清暗中勾结，由县政府下令撤销张世聪的白石水小学校长职务，赶走一些进步教师。5月，梁文光等又勾结奸商在白石水抢购大米，用船从武利江外运资敌，牟取暴利。由于他们派人在通往白石水圩的各条路上抢购，大米根本没到市场，致使朝晚无米的贫苦群众，断炊挨饿。白石水区委根据这种情况，为狠狠打击汪派和奸商，保障群众的正常生活，决定发动群众召开反汪大会和进行请愿，开展反运米资敌斗争。经过充分动员和组织，选定一个圩日，召集武装民兵、师生及农民共2000多人在白石水圩召开反汪大会。中共白石水区委组织委员岑月英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历数梁文光等勾结奸商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运米资敌的罪行，控诉梁文光等压制抗日民主运动、贪污腐化、鱼肉人民的劣迹，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倒汪派汉奸卖国贼，禁止运米资敌，平抑米价，保护群众利益。此时，会场上群情鼎沸，抗日、反汪的口号响彻白石水街。接着，群众拥

至白石水乡公所请愿。乡公所乡丁早已惊慌失措，将大门紧闭。请愿代表指名要县督学谭启元出来答话，谭启元十分惶恐，不敢露面，许久才不得不传出话来，要求群众派代表进入乡公所里与他谈判。当打开大门让岑月英等几个代表进去时，一群武装民兵也乘机闯进去，护卫在代表身边，谭启元及乡公所人员惊恐万状。谭启元一开始就用花言巧语哄骗代表，但代表们不理睬他，并庄严地向他提出要求：(1)反对无理撤销张世聪校长职务。因为张世聪热心办学，成绩显著，宣传抗日，救国救民，有功无过，撤销张世聪的职务是破坏抗战的汉奸卖国行为，坚决要求恢复张世聪的职务；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民主政治，制止一切破坏民主的行为，保障人民抗日救国的权利。(2)禁止运米出口资敌，反对囤积居奇，要求平抑米价，保护人民利益，严惩奸商非法行为。(3)实行合理负担，反对借“抗战”之名贪污舞弊、抓丁拉夫、敲诈勒索，大发国难财。代表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把谭启元及乡公所人员质问得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请愿要求合理，表示全部接受。请愿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此后一连几个圩日，武装民兵及群众都到通往白石水圩的各条路口上宣传，并拦截奸商外运的大米，市场粮价迅速下降，群众十分高兴。

寨圩反运米资敌的斗争。1940年5月，中共寨圩特支根据合浦中心县委关于反汪反逆流的指示，首先开展如下几方面的工作：(1)在合浦简师的师生中组织辩论：“要不要抗日？如何抗日？”通过宣传教育，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2)合浦简师进行课程改革，开设《社会科学》、《大众哲学》、《陕北公学散文》等课程，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3)到农村举办农民识字班，向农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奸商运米资敌的罪行，动员农民参加反汪斗争。接着，寨圩特支发动群众在寨圩召开反对运米资敌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约1000人。寨圩特支宣传委员蒙英翰在会上揭露国民党贪官污吏如何敲诈勒索农民，欺压群众；谴责地方官僚勾结奸商运米资敌的行为，指出这是米价暴涨，民不聊生的原因。当场有位老汉上台诉苦，说他的房屋被恶霸强占，可是乡长反而助纣为虐，把他的房屋判给恶霸，使他有冤无处申。群众听了老汉的控诉无比愤慨，纷纷跟着他前往乡公所找反动乡长质问。群众向乡长提出两个要求：(1)禁止奸商运米出境资敌；(2)不准任意欺压百姓，要乡长归还老汉的房产。那老汉当面指控反动乡长敲诈勒索、欺压人民的罪行。乡长见势不妙，慌忙躲起来。随后，寨圩群众四出堵截奸商运米出境。不久，反动的寨圩区区长罗光烈却下令不准拦米出境，说谁拦就抓谁，从而把这场群众爱国运动镇压下去了。

“合浦米案”历时半年之久，参加人数之多，涉及地区之广，在北海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它标志着北海地区革命斗争高潮的到来，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场斗争在北海革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揭露了国民党合浦县当局某些人搞投降、分裂、倒退的丑恶面目，促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觉醒；(2)打击了地方官僚和奸商的卖国行径，致使他们运大米、桐油、铜元等资敌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3)利用群众的力量平抑了米价，保障了人民起码的生活；(4)通过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对人民进行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5) 这场反汪反逆流的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与群众的经济利益相联系，使群众切身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斗争，才能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接受党的领导，为北海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但是，由于合浦地下党在斗争形式上不够注意隐蔽，到处都采取同一形式，提出同样的政治口号，使国民党顽固派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组织的，以致一批党员被捕，较多的党员暴露了。后来，不得不将一批党员转移，不利于继续开展原地区的斗争。

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

以邓世增和李本清为首的合浦县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西场、小江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之后，又把屠刀伸向白石水区。1940年5月中旬，在小江区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被镇压的第二天，合浦中心县委和白石水区委得到邓世增两天内派兵镇压白石水区反对奸商运米资敌斗争的情报。在这个紧急关头，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从小江匆匆赶到白石水，召集白石水区委委员李英敏、张世聪、岑月英、王克、朱兰清等召开区委会议，总结西场、小江反对运米资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抵抗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白石水反对运米资敌斗争的对策。黄其江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西场和小江反对运米资敌斗争被镇压的情况，并指出国民党武装镇压小江群众反对运米资敌时，群众要求打，他认为上级没有指示而不敢同意，结果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看来白石水应该打，不打就必然遭到同西场和小江一样失败的命运。这时大家极端愤怒，都主张要打。并一致认为，如果白石水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不进行武装自卫，势必重蹈小江的覆辙，招致斗争失败、人民遭殃的恶果。于是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坚决进行武装自卫，给国民党顽固派一个迎头痛击。作出决定后，中共白石水区委立即进行武装自卫的准备，并定于6月2日用“团练”的方式，召开武装自卫的誓师大会。

6月2日，白石水区各地的农民、青年、师生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1000多人（其中武装人员数百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枕檬坳的一个大草坪上，召开“团练”誓师大会，号召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坚决进行武装自卫。张世聪在会上回顾了白石水区半年来的斗争历程，总结了斗争胜利的经验。并指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已经烧到北海沿海和邻县灵山，做亡国奴的危险即将降临头上。而国民党顽固派镇压了西场和小江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后，正在准备镇压白石水区的抗日人民。他讲到激动的时候，拔枪朝天“啪！啪！啪”地连放三枪，以表示斗争的决心。并用简单、通俗的话语，引导大家分清大是大非，确立武装自卫的决心和信心。接着，他叫人牵来一头山羊，当场杀了，把羊血冲进一罐酒中，分给大家，并带头举杯，说：“誓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永不反叛！”大家一饮而尽。最后，张世聪提议各村组织武装小组，日夜轮流放哨，以螺角声为号，发现敌人，

一齐出动，与敌人决战到底。

第一次反“围剿”。6月8日，邓世增派李本清率县自卫队和乡保队共1000多人，对白石水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对于敌人的突然袭击，白石水人民早有准备，多数都撤到山上去了，只有东馆小学的两个女教师罗德崇和蔡琳来不及撤退而被捕了。当天晚上，白石水区委组织群众，集结队伍，纷纷下山，把乡保队占领的地方都包围起来。并针对乡保队是被骗来打“土匪”的情况，广泛开展政治瓦解的宣传教育工作，向乡保队说明白石水人民是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汪派汉奸和贪官污吏的人民，不是什么“土匪”、“奸匪”，希望乡保队不要受李本清、梁文光的欺骗，为他们送死。同时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一致打日本、保家乡”等口号，警告乡保队赶快撤回去。当乡保队知道自己被李本清骗去并不是打“土匪”，而是与共产党战斗的真相后，就完全失去了战斗信心。6月9日早上，大多数乡保队就悄悄地撤走了。接着，为了营救被捕的两位女教师，白石水区委组织农民武装队伍包围占据东馆小学的乡保队，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指出他们应走的道路；并断绝其粮水供应，使他们日夜没饭吃、没水喝，又不能睡觉，疲惫不堪。农民武装队伍派人和他们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他们无条件释放被捕的两位女老师后就让他们撤走了。当天黄昏，农民武装队伍尚未撤离东馆小学，李本清率领的自卫大队从金街袭来，双方发生战斗。农民武装队伍当机立断，把队伍分为两部分，派少部分队伍撤至离东馆小学数10米的勾刀水村，牵制敌人，并保护群众财产；其余大部分队伍集结在东馆小学对面的高山上，居高临下打击顽军。顽军当晚不仅不敢进入学校，而且惊慌失措，彻夜不眠。李本清在行军中也跌伤了，非常气愤。6月10日，李本清率领的自卫队集中兵力围攻勾刀水村，派驻勾刀水村的少部分农民武装队伍，坚持三天三夜据守碉堡英勇抗击顽军，第3天晚上才机智地安全撤离勾刀水村。顽军进入勾刀水村后一无所获，李本清下令焚烧勾刀水村便率队撤走了。经过3天的战斗，顽军死伤30多人，农民武装队伍只有党员张世柏牺牲。各乡保队自动撤走后，国民党留下县自卫大队的一个中队驻守东馆，把大塘的乡保队驻守芳塘，并在平山建立一个新保队，妄图继续监视和限制农民武装队伍的行动，其余队伍跟着李本清灰溜溜地逃回廉州了。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军事“围剿”便以失败告终。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后，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群众更加相信共产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斗志十分高涨，而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利于农民武装队伍发展的政治局面。

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军事“围剿”后，合浦中心县委估计国民党顽固派决不会就此罢休，必然卷土重来，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应该及早做好迎击的准备。县委书记黄其江向南路特委作了请示汇报，得到南路特委的大力支持。南路特委认为合浦中心县委领导白石水人民进行武装自卫斗争是正确的，应坚持下去，并派在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游击战争的南路特委委员陆新作为合浦县委特派员到白石水加强指挥，领导白石水武装斗争。合浦中心县委又从公馆、白沙等地抽调廖尚智（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周洪英、赖子能、赖子坤、蒋四哥、吴亚南、

吴十四哥等 10 多人到白石水充实武装队伍。同时，把已经暴露的李英敏、岑月英、曾德才、罗德崇、卢冠群等调离白石水区。陆新按照南路特委的指示，为了加强白石水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组建了白石水武装大队，由 200 多名武装农民组成，张世聪担任大队长。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武装大队的领导，武装大队成立了党支部（直属县委领导），书记陆新，委员张世聪、朱兰清、廖尚智等，专门领导武装大队和武装斗争。

由于经济比较困难，无法解决整个武装大队的经济给养问题，必须组建一支政治坚强、武器精良、短小精干的脱产骨干武装队伍，作为武装斗争的常备中坚力量。因此，又把白石水武装大队编为 3 个中队，其中一个常备中队（30-70 多人），由黄家祚、周洪英、廖尚智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和指导员；两个非常备中队，也叫民兵队伍，平时在家生产，保卫村庄和群众，战时参加打仗。陆新按照《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阐明的政治军事原则，结合白石水武装斗争的实际情况，对常备中队讲授了许多军事课和政治课。特别详细讲解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开展军事训练，从放哨站岗、紧急集合、行军联络、传递口令，到利用地形地物、瞄准射击等科目，都进行了训练和演习，使这支年轻队伍的革命战士，掌握了许多对付敌人、打击敌人的办法和本领，大大提高了常备中队的战斗力。陆新对白石水区武装斗争满怀信心。他认为白石水武装大队的力量虽小，并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包围之中，但是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国民党顽固派是无法消灭白石水武装大队的。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打破后，一方面，双方都在重新组织力量，调整部署，准备新的战斗。另一方面，双方都在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这时争夺的一个重要对象是驻在灵山一带的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就是领导“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日军占领南宁后，蒋介石把蔡廷锴部调到粤桂边的灵山一带。7 月，白石水武装大队党支部决定派朱兰清和黄春泰等为代表，到灵山三海岩二十六集团军总部递交呼吁书，控诉合浦县长李本清等贪官劣绅与奸商勾结，运米出口资敌，破坏团结抗战，武装镇压抗日人民的罪行，要求二十六集团军主持正义，支持抗日人民，打击奸商，制止官兵镇压和屠杀人民。接见朱兰清一行的两个军官听了申诉后，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但交谈中流露了同情的表示，并答应向总部汇报再酌情处理。此时，二十六集团军总部也收到了邓世增和李本清发来的电报，说合浦白石水区“奸匪”暴乱，请速派兵镇压。电报刚好落在二十六集团军秘书张凤楼的手上，张凤楼是在集团军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他把电报先交给在二十六集团军政工队工作的共产党员莫平凡，并征求莫平凡的意见。莫平凡立即找中共灵山特别支部负责人罗英商量，拟定推说情况不明，待派人调查、了解后再行处理。张凤楼按此意见报告蔡廷锴，蔡廷锴即表示同意，并指派中校劳耀祖率领莫平凡、何林、温之淮等前往白石水调查。

调查组到达白石水后，梁文光向调查组诬告张世聪、朱兰清等如何煽动刁民，聚众造反，

反对政府，抗拒官兵，要求蔡廷锴总司令派兵“剿灭”，以保地方安宁。接着，调查组深入现场调查事实真相，看见勾刀水村全村被烧，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便找来当地乡绅、群众座谈，听取他们讲述李本清如何率兵“围剿”，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参加座谈的乡绅、群众一致要求调查组查清事实，制止再次屠杀人民和赔偿人民的损失。调查组还到红岭小学，会见了农民武装队伍。武装队伍负责人向调查组阐述了白石水武装自卫的起因和经过，并要求调查组主持正义，合理解决事件。调查组肯定了白石水人民反汪派奸商运米资敌的正义性，鼓励人民坚持斗争，争取合理解决事件。调查组回到灵山向蔡廷锴作了汇报，说明张世聪、朱兰清只是为了反奸商运米资敌，组织人民抗日保乡，遭到合浦县当局派兵攻打。蔡廷锴听了汇报后，派人复电邓世增、李本清，指出白石水的武装冲突，纯属内部纠纷，宜于和平解决。蔡廷锴这样处理白石水问题，是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敢冒风险，拒绝派兵，直接支持了白石水人民的正义斗争。但是，邓世增电告蒋介石和白崇禧，诬蔑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斗争是“奸匪暴乱”，并控告蔡廷锴支持和纵容共产党。蒋介石为了加强反共，排斥非嫡系，便下令彻底清剿白石水的“暴乱奸匪”，并撤销蔡廷锴的职务，把蔡廷锴调到桂林了。

第二次反“围剿”。10月初，邓世增又派李本清率兵对白石水进行第二次军事“围剿”。兵力除合浦县自卫队、白石水区各乡保队外，还有国民党一七五师的一个营（简称正规军），共1000多人。顽军分兵五路，重点进攻白石水区的中心地区大成、楠木根、枫木根、木头田、三角塘一带，妄图消灭白石水武装大队的主力部队，打散白石水的民兵队伍，围捕白石水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由于武装大队早有警惕，作了充分准备，在顽军到达白石水之前，武装大队的主力 and 民兵就离开村庄撤到山上了。顽军进村除了大肆劫掠群众财物外，毫无所获，便在中心地区驻扎，平山坡、芳塘、东馆、大成、新田埔、公鹤塘、柑子根、珠绿窝、木头田、石碑排等都驻扎了顽军。顽军每天出兵围村、搜山、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共产党员朱桓山（朱晚哥）是柑子根小学炊事员，被顽军围捕捉到。因他是朱兰清的叔父，顽军便说他是朱兰清的死党，对他威迫利诱，严刑拷打，要他供出武装大队及地下党的情况，但朱晚哥忠贞不屈，始终不暴露半点秘密。后来顽军把他拉到大成圩朱兰清住宅边枪毙，并在他的小腹加上两刺刀，造成恐怖气氛，借以警告朱兰清，恐吓群众。与此同时，顽军还通过地方反动分子欺骗、强迫群众开会，听县长李本清的所谓“训话”，强迫群众集体“自首”，实行“十户联保”等，企图瓦解武装大队的群众基础，使武装大队无法立足。顽军还采取小村拼大村，把大村围起来，严加管制，群众出入要检查，行动不得自由，不准带粮食外出，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切断武装大队与群众的联系和一切接济。总之，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企图把武装大队从中心区内赶走，使武装大队失去群众基础，达到消灭白石水区武装力量的目的。

李本清率领的一营正规军驻扎在东馆，协助李本清进行“围剿”。因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军事“围剿”的兵力比第一次大得多。白石水武装大队党支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得知，正规军是被李本清骗来打“土匪”的，他们到达白石水后，才知道打的是抗日群众，他们士气低

落，不想打仗。于是，武装大队党支部开展思想宣传攻势，在各条交通要道上张贴标语，说明武装大队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并表明武装大队“只打反动的自卫队”，“不打抗日爱民的军队”，号召“团结抗日，争取抗战胜利”。思想工作收到了很好效果，武装大队又发动群众给正规军送去一些食物，表示慰劳抗日官兵，他们很受感动。从此，这一营正规军按兵不动，没有出击武装大队。

随后，武装大队集中力量对付李本清，并遵照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采用游击战术，日间伏击、袭击搜山顽军，夜间打枪骚扰驻地顽军。顽军到处被动挨打，弄得精疲力竭，士气低落。武装大队以常备中队为骨干，召集楠木根垌、枫木根垌、木头田、黎家垌等地民兵 200 多人，组成一个大队作为主力，其他村庄民兵则仍分散，协同主力作战。由于武装大队有群众掩护，地形熟悉，武装大队的指挥部常在佛子岭一带，与顽军距离很近，但顽军始终摸不清、武装大队选中目标就打，打了就走，如天兵下降，神出鬼没。顽军则老是被动挨打，疲于奔命。武装大队根据顽军的活动规律，每天都派出三四个小分队（由几个或 10 多个人组成）进行骚扰、伏击顽军，当顽军清醒过来要出击时，小分队早已撤退，顽军只能向深山密林扫射，白费大量弹药。有时还引起驻扎在各村庄之间顽军的误会，互相开火，自相拼杀。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顽军伤亡 30 多人，而武装大队无一伤亡。李本清在军事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其所谓政治瓦解、经济封锁的阴谋也失败了。李本清觉得不能再打了，留下一个自卫中队驻守柑子根和东馆继续监视、限制武装大队的活动之后，便灰溜溜地带领其他兵卒撤回廉州了，乡保队也分别撤回各乡了。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军事“围剿”又遭失败了。

1941 年春节之后，驻扎在白石水区芳塘、东馆一带的正规军营长黄秉元放出话说：“我们是奉命来的，但据了解，张世聪、朱兰清这班人都是好人，是好打不平的，我们不剿，希望与张世聪谈判，和平解决事件。”于是，黄秉元通过芳塘的绅士张雅斋、张金声向张世聪反映，经武装大队党支部研究后，同意和黄秉元见面，地点由武装大队决定在粟米麓村，并由知名人士张存芳陪同黄秉元一起来谈判。双方见面后，张世聪首先发言，赞扬黄秉元及其领导的部队，是抗日的队伍，奉命进驻白石水区之后，没有攻打过武装大队，对黄秉元的正义行动表示感谢。接着，张世聪介绍了白石水区人民怎样反对汪派奸商运米资敌，主张抗日除奸，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烧杀掳掠，以及武装大队怎样武装自卫，主张讲和，团结抗日等整个过程。黄秉元听了并不反对，但黄秉元提出了许多问题，目的是想摸清武装大队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化妆成张世聪警卫员的陆新也阐明武装大队是主张抗日的，是同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管什么党派，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要团结抗日，只有各党派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战才能胜利。那些奸商运米资敌，破坏抗战，武装大队才反对他们。经过谈评，黄秉元知道张世聪等是进步的和抗日的，不是什么土匪，但还怀疑张世聪等是共产党员。

第三次反“围剿”。1941 年 2 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对白石水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这

次“围剿”由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保安队副司令陈国勋指挥，兵力除了已经驻扎在白石水区芳塘、东馆一带的一个营正规军之外，还有第八区保安队和合浦县自卫大队以及乡保队共1000多人。这次“围剿”的特点是以重兵进驻，全面占领白石水区的村庄，在军事上对白石水武装大队造成强大的威胁。同时放出和谈的声气，企图对武装大队实行政治诱降。因此，顽军进驻白石水区后，按兵不动，没有出兵搜山、围村，也没有寻找武装大队作战，而是放出话要找张世聪、朱兰清谈判和平解决。此时，武装大队在很多交通要道的墙壁上，写了很多争取和平解决事件的标语。陈国勋通过绅士张雅斋、张金声与武装大队联系谈判事宜。武装大队党支部根据合浦中心县委的指示，决定同意与陈国勋谈判。

在谈判之前，陆新主持召开了武装大队党支部和白石水区委联席会议，研究对策。会议确定谈判的先决条件：要对方首先撤出白石水区中心地带的一些据点，如楠木根垌、石碑坝、木头田等村庄，表示对方的谈判诚意，才能开始谈判。会议提出和平解决事件的基本条件：(1)停止武装进攻；(2)惩办造成事件的罪魁祸首李本清、黄南滨、梁文光等；(3)赔偿群众损失，如烧毁村庄、抢掠的物资等；(4)抚恤被害群众的家属；(5)保证当地人民自由和抗日权利，保证不逮捕群众。会议决定由张世聪为谈判的全权代表。随后，陈国勋及其参谋和黄秉元在张存芳的陪同下来到白水塘村，双方开始谈判。张世聪按照联席会议的决定，向陈国勋提出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基本条件。陈国勋也提出了和平解决事件的条件：(1)停止武装斗争，解散武装队伍；(2)缴出部分枪支；(3)张世聪、朱兰清二人要写悔过书；(4)张世聪、朱兰清二人离开白石水区，可到国民党政府任职，或外出读书。这些条件实际上要武装大队认错投降，这是诱降阴谋。张世聪对陈国勋的无理要求当即严词驳斥，并强调，白石水区人民自动起来抗日救亡，保卫家乡，反对贪污勒索，反对运米资敌，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光明磊落，完全正确，没有什么错误，没有什么要悔过的，悔过书绝不能写。相反，李本清、黄南滨、梁文光破坏团结抗日，压迫人民，发动武装进攻，烧杀掳掠，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要他们写悔过书，而且应该惩办他们。李本清发动武装进攻，人民群众被迫自卫是理所当然的，纯属正义行动，没有任何理由要人民群众缴枪，一枪一弹都不能缴。张世聪、朱兰清二人有行动自由，由本人自行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涉。至于停止武装斗争问题，只要国民党武装不进攻，武装冲突就自然停止。谈判双方争论的关键是，陈国勋要张世聪悔过、缴枪，这是张世聪绝不能接受的；张世聪要求陈国勋惩凶、赔偿和抚恤，陈国勋也是不肯接受的。经过反复争论之后，陈国勋耍了个花招，把缴出部分枪支改为缴一两支坏枪也算；不写悔过书也可以，找些地方绅士写个证明书，证明张世聪、朱兰清二人不是坏人便可以了。张世聪坚决反对，指出陈国勋是换汤不换药，是“祸国有功，抗日有罪”，坚决拒绝。于是，谈判破裂。

陈国勋政治诱降阴谋失败后，准备在军事上大举“围剿”。可是，此时日军在广东沿海各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3月3日，日军占领了北海，威胁着合浦县国民党统治中心廉州，国民党为了防守廉州，陈国勋逼于无奈，不得不放弃大规模武装扫荡白石水的计划，除了继续

保留东馆、柑子根两据点的兵力外，其余队伍便匆匆忙忙撤回廉州了。因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军事“围剿”又宣告破灭了。

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3月，广东省委关于将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指示逐级传达到白石水区。这是广东省委于1940年夏作出的决定，由于各种缘由而拖延至1941年3月才传达到白石水区。1940年夏，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向广东省委汇报了白石水武装斗争的情况。广东省委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搞武装斗争，既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总方针，又会暴露地方党组织，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隐蔽待机的方针，要求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但是，当时白石水武装斗争刚开始，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周楠没有传达和贯彻这一指示。1940年11月，日军从钦廉地区撤出而进入越南北部，这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逆流逐渐形成高潮，蔡廷锴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即国民党二十六集团军被解散，二十六集团军中的一些中共党员被捕。12月，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撤销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中共粤北、粤南省委，隶属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共南路特委归粤南省委管辖。为了更好地保存党的骨干力量，中共粤南省委根据原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再次指示南路特委将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并将白石水的主要干部安全转移，埋好枪支，解散队伍。为了帮助南路特委能迅速传达和贯彻这一指示，粤南省委派组织部长王均予与周楠一起到南路工作。王均予到南路后，为了顺利贯彻执行粤南省委的指示，决定改变南路特委机关的领导方式，改变南路特委成员集中在广州湾的状况，实行分片领导，单线联系，个人负责。雷州地区的工作由周楠负责，钦廉地区的工作由南路特委宣传部长杨甫负责。南路特委还特别强调，各地党组织要继续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停止一切容易引起党组织暴露的政治口号和政治活动；既要注意隐蔽身份又要适当斗争，在斗争策略上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1941年初，全国的政治形势迅速变化，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共中央发出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要求全党要集中力量痛斥亲日派阴谋家和内战挑拨者，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并要求在国统区内的党组织必须有序地隐蔽起来，进行坚决适当的斗争。1941年6月，国民党加快了在广东迫害和拘捕中共党员的步伐，驻韶关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清洗军中的共产党员，共有200多名中共党员或被捕或被杀，形势十分严峻。中共粤北省委迅速转移干部，做好应变准备。9月，中共南方工委对粤南省委发出指示：为适应长期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新形势，党的组织工作仍以巩固发展，稳扎稳打为主。对已被破坏及暴露的地区，应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割断已暴露的一切关系。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南路特委迅速决定立即停止白石水武装斗争，埋藏好全部武器弹药，主要领导骨干张世聪、朱兰清、卢文等迅速转移，已暴露的党员和群众迅速疏散。由杨甫以“省委指示”的名义正式向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传达了中共南路特委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主要内容是：合浦白石水武装斗争在国统区不符合统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应马上解散武装队伍，停止武装斗争，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此时，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尽管思想不通，但仍很快地将南路特委的决定向白石水区委和武装

大队党支部作了传达。县委书记黄其江来到白石水区，在枫木根垌的红垌村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南路特委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武装大队党支部成员陆新、张世聪、朱兰清、廖尚智以及白石水区委书记卢文，还有武装大队的重要骨干朱菊清等。黄其江在会上反复解释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意义，强调今后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争取和平解决事件”这一方针去进行，并提出了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在白石水区开展群众性的签名运动，联名请求国民党和平解决白石水事件。二是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上层人士本着息事宁人的宗旨出面调停，敦促国民党和平解决白石水事件。三是依靠党组织和各种进步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大造舆论，迫使国民党和平解决白石水事件。陆新、张世聪、朱兰清、廖尚智、卢文等听完黄其江的传达后，感到难以理解，思想不通。因为以前南路特委和合浦县委是支持武装斗争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开创了很好的政治局面。现在却说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要撤退武装大队，要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白石水人民，白石水人民被迫武装自卫，这有什么错误呢？难道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不正是破坏团结抗战、破坏统一战线吗？并觉得依靠上述一些措施来争取和平是靠不住的。尽管他们的思想不通，但这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而且此时还没有提出取消武装大队、撤退干部，大家只好服从，按照上述措施去做，但均无成效。

正当传达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之时，武装大队尚未解散，领导干部尚未撤离，而国民党顽固派又于1941年10月纠集兵力对白石水区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合浦中心县委在顽军武装进攻白石水之前已得到确实的情报，县委书记黄其江奉命赶到白石水区召开武装大队骨干分子会议，极力做说服工作，布置武装大队秘密撤出各村庄，驻扎在金街、五王大岭、六罗垌以及马兰等地，主要的民兵骨干队伍和地方工作人员也撤到山上隐蔽，因而武装队伍完全避开了敌人。这样，陈国勋率领的第八区保安队十团、国民党一七五师一部和合浦县自卫大队和白石水区各乡保队，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横行无阻，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白石水区大成、楠木根垌、木头田、三角塘、枫木根垌等70多个村庄。顽军所到之处，任意捉人，把所有的青壮年男子和剪短发的妇女都全部抓去（因为参加武装斗争的女同志都是剪短发的），并把抓到的群众全部押解到其驻地去审查，让当地的反动分子去识别，看哪些是武装大队的骨干，哪些是民兵，哪些是支持武装大队的人。强迫他们自首、缴枪，有的则强迫带路去搜山，妄图追击武装大队，逮捕武装大队的人员。当时被拘捕的群众1000余人，其中有40多人被押到廉州坐牢，随后有20多人死于牢中（其中共产党员3人）。与此同时，白石水区许多武装民兵在山上自动集结，要求白石水区委和武装大队党支部继续领导白石水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决心要和顽军战斗到底。根据挫败顽军三次“围剿”的经验，这些武装民兵信心和决心很大。但是，他们到处找不到武装大队，异常焦急，有的抱枪痛哭，预感到大祸临头，十分悲愤。其他群众，见武装大队没有主动出击顽军，任由顽军到处疯狂围村、搜山、捉人，情绪也普遍低落下去了。

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分兵“驻剿”，很多重要的较大村庄都驻有顽军，实行并村围剿，严加控制，妄图把群众和武装大队隔绝，困死饿死武装战士。国民党顽固派还成立反动的“剿匪委员会”，利用一些“自首”的人去当保队，搞联防巡夜。当地山多林密，容易收藏，就强迫群众斩树，使武装战士无藏身之地。还出布告，写标语，悬赏缉拿张世聪、朱兰清。总之，国民党顽固派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消灭白石水人民革命力量。

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在白石水区到处疯狂围村、搜山、捉人，白石水抗日革命根据地和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之时，合浦中心县委先后通知白石水区委书记卢文、武装大队特派员陆新到县委所在地布置工作。卢文和陆新回到白石水后，召开白石水区委和武装大队党支部领导骨干会议，传达、贯彻执行南路特委的指示，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解散武装大队常备中队，分散收藏武器，撤退暴露的党员干部，把张世聪、朱兰清调到高雷地区，把陆新转移到合浦农村教书，把卢文调到灵山任中共灵山特支书记，其他武装斗争骨干和暴露的党员陈秉琨、朱菊清、黄七叔、廖尚智等也都撤离白石水。至于参加武装斗争的许多民兵骨干和积极分子，人数较多，当时不可能都作撤退安排，于是有的离乡背井，四处逃生、有的被迫自首、有的被捕被杀。还有许多群众被迫上山或逃往他乡躲藏，不少人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非常悲惨。这样，生机勃勃的白石水抗日革命根据地，很快便处于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之中。从而，结束了坚持一年半的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

解散武装大队，停止武装斗争后，白石水区人民群众很失望，埋怨情绪十分强烈。国民党顽固派对白石水区的革命群众肆行劫掠，在白石水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驻剿”，全面恢复了保甲制度，加强了反动统治，用种种方法向人民群众进攻，特别是滥捉征兵，企图彻底摧残白石水区的有生力量。原来国民党政府征兵法规定，独子免征，两兄弟只征一个。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蛮不讲理，不择手段，兄弟两人一起拉走，独子也不能幸免，青壮年男子基本都被拉光。在经济上又进行各种敲诈勒索，增加许多苛捐杂税，如户口捐、剿抚费等，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因此，进一步激起了白石水区人民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使白石水区人民群众更加留恋以前的武装斗争，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获得翻身解放。

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白石水武装大队，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军事“围剿”期间，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这的确是重大的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白石水区反对运米资敌的斗争和组织武装大队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和军事“围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许多群众不但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或其他亲人参加武装大队，而且从四面八方给武装大队提供粮食、衣物、弹药，替武装大队送情报，当向导，护理伤病员。二是参加武装大队的农民觉悟高、决心大、作战英勇以及党组织加强对武装大队的领导，委派在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的张世聪和有指挥作战能力的陆新到武装大队担任领导，加强指挥。因而武装大队是有作战能力的，在指挥作战上能正确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来犯的顽军，而且又能在政治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丝毫没有侵犯工农群

众及各阶层的利益，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赞许和支持。三是由于白石水人民的抗日自卫武装斗争是正义的斗争，不仅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得到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参加军事“围剿”的国民党正规军营长黄秉元了解斗争真相后，在“围剿”中采取按兵不动的态度。邓世增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打电报给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诬蔑白石水人民的正义斗争是“奸匪暴乱”，要求蔡廷锴出兵“清剿”。但当蔡廷锴了解斗争真相后，拒绝出兵，并致函张世聪“静候政治解决”。四是白石水区山高林密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武装大队开展游击战争。因此，白石水武装大队不但可以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军事“围剿”，而且可以把武装斗争坚持下去，并逐步发展。

国民党顽固派实行“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之后，中共中央对不同的地区确定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在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既要与国民党的抗日军队合作抗日，又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共、反共政策，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和武装自卫政策。合浦中心县委领导白石水人民在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进行的抗日自卫武装斗争是符合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是正确的。但是，广东省委个别主要领导人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处于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的北海地区看做是国民党统治区域，把白石水人民在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进行的抗日自卫武装斗争，看做是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因而认为这个斗争违反了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武装斗争政策，决定立即停止武装斗争，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既不符合北海地区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方针和武装自卫政策，是错误的。停止武装斗争不仅丢失了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使一支革命武装队伍不打自垮，更严重的是使白石水区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惨重的灾难，挫伤了白石水区以至整个北海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情绪，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五、北海三二事变

1941年3月3日，日军为了继续霸占海南岛和涠洲岛这两个战略要地，加强对北部湾的封锁，以便做好发动太平洋战争出兵占领东南亚在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疯狂地入侵北海。日军侵占北海后，实行“三光”（抢光、烧光、杀光）政策，致使北海领土受蹂躏，人民被遭殃，造成了北海历史上最为深重的灾难。这就是使北海人民蒙受日军侵害的严重灾难的北海三三事变。

1941年3月1日，日军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并派汽艇抵南满、高德、岭底附近海面游弋，探测北海岸上的军事布防。由于北海防卫空虚，当日军汽艇抵达北海时，市民一片心慌，连忙疏散。当天中午，北海市民不见日军开枪开炮，便有一部分人返回市区。2日，又有数艘日军汽艇三次抵北海港海面游弋。3日凌晨2时，天气阴冷，并下着蒙蒙细雨，日军又派4艘战舰、10余艘登陆艇和汽艇，突然开到北海港口海面。接着，日军出动1000多人，从高德、岭底、冠头岭附近以及龙皇庙、外沙一带分三路登陆北海。日军先抢占高德，切断北海与

合浦的通道，然后向市区挤压夹击。这时，北海的守备力量十分空虚，北海守军一七五师已北撤在钦邕之间抗击日军，驻防北海的只有一个国民党武装自卫中队（队长黄光球）共 80 多人，只有两挺轻机枪和一些七九式步枪。此外，还有一个属北海镇政府领导的抗日自卫中队（队长林万里）约 80 人，武器配备很差。队员从保甲长中抽调出来充当，只作一般军事训练。国民党武装自卫中队分驻外沙龙母庙和珠海中路的龙皇庙，他们既没有作战经验又贪生怕死，日军汽艇还未逼近海岸，仅用机枪试探北海驻军实力时，龙母庙的驻军即仓皇开枪还击。日军了解情况后，即用猛烈炮火扫射龙母庙驻军，并在高德沙脚、游泳场两处登陆。龙母庙的驻军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由班长带领士兵逃至赵屋岭（今风机厂），与黄光球部会合后即向中山公园、福成方向逃窜。而北海警察局、镇政府、抗日自卫中队等兵员，没有统一指挥，更没有作战准备，便“丢盔弃甲”抛下百姓不管、自顾逃命。

从外沙岛登陆的日军，继续追进爱生院（今水厂）。这时，退到赵屋岭的国民党武装自卫中队（只有 10 多人）被迫向追来的日军开枪，进行自卫。他们发觉日军已作弧形包围后，身为中队长的黄光球不但不积极指挥作战，反而束手待擒，结果被击中胸部，当即由士兵用渔笠将他抬着向白屋、龙潭方向逃走。北海市民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下，纷纷向市郊马栏、横路山、龙潭方向逃避。大部分市民都没有来得及带东西，只随身带一两件衣服，年纪大的索性留在家中东藏西躲。

当天早上 9 时左右，龙潭党支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安置难民。会议决定：（1）发动农村群众，做好安排难民的工作（解决他们住宿、粮食和炊具等问题）；（2）维持治安，将现有各自卫队和联防队，联合起来统一指挥，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3）设立岗哨，日夜巡逻，晚上派人深入了中山西路、菜园路、大水沟一带，了解日军的动向，并帮助市民逃出北海市区；（4）发动开明人士捐粮，捐借被服，使难民暂得温饱。当天晚上，龙潭抗日联防队扩大了放哨范围，并安排张冠均、陈心树分别负责赤江村、横路山村的放哨任务，若发现日军即迅速通报各村群众。龙潭党支部书记王惠澜和党员陈心树潜往北海市区，带领居民疏散到龙潭和横路山一带农村，龙潭党支部则号召村中农民招待疏散到各村庄的居民，解决他们的住宿和吃饭问题，其中林朗天一家接待的人最多，起了带头作用。

日军在北海登陆后，分别设岗哨在茶亭路、合浦一中和北海村一带，士兵夜宿在珠海路民房，军官宿在军舰上。从 3 月 3 日至 9 日，日军在北海的 7 天里，从市区街道民房一直到东郊高德沙脚，南郊龙潭村，西郊冠头岭、南漓一带，逐家挨户进行烧杀奸淫掳掠。据善后调查统计，北海共有 2-3 万斤粮食、2000 多只三鸟、300 多头生猪、20 多头耕牛被日军劫走。有 100 多人死、伤于日军的刀枪或棍棒皮鞭之下，日军还为了抢运物资拉了 50 多人当民夫，撤退时还拉了 50 多人到军舰做劳役。有一大批妇女、少女被日军强奸或轮奸，小的 10 岁，大的 50 岁，有些 13 岁、14 岁的少女被轮奸至死；日军还把搜索出来的良家妇女约 60 多人押上军舰供其淫乐，后来这些妇女被放回来时已不足半数。有 100 多间民房被日军泼上汽油焚烧。地角、

外沙海面一带有几百余艘渔船和货船被日军抢走，还有一大批的商品物资被日军运走（价值千万元以上），北海每家商号的物资损失更无法统计了。日军对北海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日军除了在北海烧杀奸淫掳掠之外，为了“纪念”早在1936年在北海被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士杀掉的“丸一药房”有间谍行为的中野顺三，还组织官兵前往原址进行追悼祭奠，公开对北海市民作报复性的威胁。

日军按他们的军事部署，在北海大举扫荡抢劫7天之后，便自行撤退。其间北海市容萧条，人心惶恐，生活无着。面对这种凋零景象，返回市区的中共党员争取区长潘承奎（合浦专署第五区区长）同意，成立善后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地下党动员社会青年、学生、教师约有40人参加（其中有地下党员6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难民进行了善后救济和安顿工作。龙潭党支部也派人参加善后工作，帮助解决居民返回北海的住宿和生活等急迫问题。

六、隐蔽精干方针的全面贯彻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全国各地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制造磨擦的事件就不断发生。1940年3月，国民党广东当局纠集3000余兵力，围攻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前线人民武装，当东江抗日纵队向东转移时，沿途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拦截和追击，致使东江抗日纵队损失惨重，处境困难。此时，为了应付国民党反共高潮的艰难处境，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4月，张文彬又从重庆到了延安，就广东党的建设、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群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建议将合浦、灵山、钦州、防城的党组织与毗连的桂南地区党组织合并，共同开展沦陷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于是，中共中央为加强华南地区的抗日战争领导，调派一批军事政治干部到广东，协助华南开展敌后游击斗争。与此同时，国民党广东当局加紧反共措施，强行解散了广东“省抗日先锋总队”和南路学生总队。5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又解散华侨回国服务团，非法拘捕一批团员，并下令通缉在外的“东团”骨干分子，这样全省的群众性抗日团体大部被解散，面对急剧恶化的政治形势，广东省委指示各地在进行坚决的政治反击后，应及时从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实行大转变，一方面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另一方面是发展组织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总结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从1940年5月4日开始，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总结全国抗战以来实行国共合作及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

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蒋介石集团继续加紧反共活动，准备对日妥协投降，酝酿发动新的反共高潮。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皓电”进一步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11月7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严重形势，发出了《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要求全党加紧统战工作，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险。党在国统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必须“全部的完全的有秩序的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此时，到南方局报告和研究工作的方方返回闽西南潮梅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部署和关于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的决定，由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

1941年5月，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进步势力的压迫日甚，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从组织领导形式到工作方式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保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执行。6月，国民党广东省当局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广东各地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特别是进入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从事抗日工作的近200名中共党员，先后遭到逮捕、清洗和杀害，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针对这样的形势，9月13日，中共南方工委向辖下党组织发出了改变党的领导体制的指示：为适应长期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组织工作仍以巩固发展，稳扎稳打为主，对已被破坏及暴露的地区，应坚持执行周恩来指示，割断一切已暴露的关系和组织，改集体领导的委员制为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缩小目标，确保安全。粤南省委把中共南方工委的指示传达到全省各级党组织。

从1941年初开始，由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以及日军从邕钦线上撤离后战争形势的新变化，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委、省委、特委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结合钦廉四属的实际情况作出部署：(1)准备停止白石水武装斗争，争取将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2)隐蔽组织，把暴露的党员转移，以合法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3)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整顿巩固组织，严防奸细混入；(4)建立秘密的党的“平行组织”；(5)利用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形式，继续团结教育群众；(6)继续开展统战工作，搞好基层两面政权。

这时，北海地区党组织首先要开展的工作是：继续撤退一大批在斗争中暴露了的干部，把他们调到较远的地方去，以利于长期埋伏。这项工作的关键是把党员干部的“退”和“进”有机地结合起来：由城镇中撤退，向农村中进军；由廉北撤退，向周边的各县发展，做到既保存

党组织的力量，又发展党组织的力量，扩大阵地。具体的安排和方向是：张进煊、朱兰清调往高雷地区，赵世尧调往粤北，庞继业调往电白；陈任生、张九匡、利培源、李英敏等先调到白石水区后被省委调往海南琼崖纵队；谢王岗调任钦防巡视员；谭俊、王克、包恭、张放等撤退到白石水区，在农村中隐蔽开展工作；卢文、岑嘉毅、王文崑、陈铭金、许家骅、朱菊清、陈秉琨等调到灵山县工作，卢文任灵山特支书记；何正四、李耀东、王振英等调到灵南工作；邓业懋等调往钦县工作；宁德棠、黄坚、黄翠玉调往东兴工作；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为了加强防城党组织领导，筹建十万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把李康寿、庞自、罗英、卢传义、钟高鉴、王瑶儒、利培凤、伍朝汉等调到防城县工作，并在东兴成立中共防城特别支部，李康寿为书记，庞自为组织委员，卢传义为宣传委员。调往各地工作的同志，一些进入了上级领导机关或武装部队，更多的是以合法职业为掩护，如教师、小商贩、医生、工人、农民等，从事地下秘密工作。还安排一批党员分别到重庆、昆明、桂林、韶关等处学习，但由于到各地学习的党员的组织关系转移和联系工作没有做好，以致有些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到1942年，北海地区暴露的党员的撤退转移工作基本完成。

接着要开展的工作是审查干部。为了保证党组织的隐蔽和安全，对新发展的党员严格审查，对他们的历史、社会关系、政治面目作了详细的审查，逐个作出结论，有不清的问题加以保留观察，有较严重嫌疑的加以隔离或采取防范措施，切实防止奸细混入。对原有的党员和党组织也进行有选择的审查和处理。

与此同时，加强党内教育工作，以提高党员的认识，加强党性，培养革命气节。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形势教育、阶级教育、纪律教育、气节教育和秘密工作教育等。教育的形式有个别教育、组织生活中进行教育、举办党员培训班和开展“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讨论等。合浦中心县委和各县、各区都举办了许多党员培训班，向全体党员讲清当时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要时刻警惕和严防国民党发动的突然事变袭击；反复对全体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和气节教育，宣讲革命英烈传，提高了党员坚持民族气节和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准备应付黑暗环境，坚持艰苦奋斗，并要求党员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具有崇高的革命气节，要求每个党员都准备了万一被捕时的应付口供，绝不暴露党的秘密，保护党组织。

1941年10月，在白石水区贯彻执行广东省委和南路特委指示，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解散了党组织领导的白石水武装队伍，分散收藏武器，撤退暴露的党员干部。

1942年1月，为了防备县一级党组织再一次被国民党破坏，南路特委书记周楠指示合浦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唐才猷秘密另外建立一个与合浦中心县委平行的组织，与原来的县委机构分开，互不发生关系，以备合浦中心县委遭受破坏以后，仍能以新建立的秘密平行组织继续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坚持斗争。这个平行组织由中共南路特委委员、宣传部长杨甫领导。平行组织由原来党员中政治上较坚定、完全没有暴露或新入党的党员组成，平行组织基本上不发展党员。

5月，中共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遭到国民党破坏，一批中共的高级领导人李大林、饶卫华、

廖承志、张文彬、徐振农等被捕。7月，广西党组织也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形势更加严峻。中共中央要求北江、西江和南路地区的党组织停止活动，撤退主要干部。8月，为了适应复杂形势的变化，防止粤北事件的牵连和有利于坚持长期斗争，中共南路特委根据中共南方工委向辖下党组织发出改变党的领导体制的指示，决定对下属党组织改变为单线联系的领导方式，将集体领导的委员制改为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11月，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组织部长唐才猷调离合浦，由杨甫负责合浦中心县委工作，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1943年3月，中共南路特委决定撤销合浦中心县委，改为单线联系，实行特派员制，由杨甫兼任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直接领导合浦（含北海、浦北）、灵山、钦县、防城四县各地区的党组织。同时，将各县特支、区委撤销，改为单线联系，实行特派员制，由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直接领导。这种领导方式的改变，有利于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此时，合浦县各区的特派员分别是：中共廉北区北海特派员张放（张树宪）、廉州特派员岑焕祥和陈普坤、南康特派员陈符隆；中共公馆区特派员谭俊、卢传义、叶信芳；中共西场区特派员包恭；中共白石水区特派员陈明景；中共寨圩区特派员劳锦。灵山县和防城的特派员分别是：中共灵山县特派员卢文（卢文于1944年3月调任中共钦县特派员，阮明任中共灵山县特派员）、中共防城特派员谢王岗。

杨甫担任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后，着重开展如下工作：

整顿恢复白石水区党组织的正常生活。白石水武装斗争停止以后，该地区的党组织生活暂时陷于瘫痪，群众思想一时混乱。为了继续建设农村抗日根据地，合浦中心县委任陈明景为白石水区特派员，领导白石水区的党组织工作。陈明景以小商贩身份作掩护，走家串户，联络党员和群众，把联系上的党员经审查后重新建立党组织。

继续开展统战工作，搞好基层两面政权。为了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为作斗争，保护党的秘密组织，北海党组织派出干部做党外上层开明人士的统战工作，通过统战关系，进入国民党机关任职，做情报工作。如邓松等继续在合浦专署机要部门工作，取得了大量重要的情报；莫平凡、黄式高、蒙环等到灵山县政府工作，陈祥军、何国达到钦县政府工作，宁碧莲等到防城县政府工作，了解有关情况，取得很多情报，对保护党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层两面政权搞得比较好的是灵山县，灵山特支通过统战关系陆续掌握了附城镇、仙岭乡、钟灵乡、龙和乡、申安乡等乡镇政权，掩护党组织的秘密工作顺利地进行。

利用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形式，继续团结教育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各县、区党组织贯彻隐蔽精干方针后，利用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形式，继续团结教育群众，如在各中小学办民众夜校，利用国民党搞农村合作的招牌组织农民搞合作社；还在农村中组织农民“同心会”、“兄弟会”、“姐妹会”等，使农民团结一心，反对国民党拉丁抽税，反对恶霸地主加租、改批和抢耕；在学校里则利用学生自治会搞合法的活动，组织秘密读书会等。对于维护群众利益的斗争，尽量采取合法的、小规模、灰色的形式，党员尽量避免公开出面。与此同时，以合法的形式继续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如参加自卫队的抗日活动，参加日军侵占北海后的善后工作，利用合法地

位组织各地中小学校的学生抗日活动。

隐蔽精干方针的全面贯彻，使钦廉四属党组织在国民党猖狂反共的情况下，不仅能保存而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从1941年到1944年秋“合浦永信烟庄事件”前，北海地区的党员由549人发展到600人（除调出的党员），灵山县的党员由20人发展到70多人（包括调入的党员，下同），钦县的党员由10多人发展到50多人，防城县的党员由数人发展到60多人。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政权工作、武装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为以后的全面发展和武装斗争打下了一定基础。但对团结中间力量及争取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很多地方未着力开展，停止白石水武装斗争消极方面的影响未完全消除，对总结武装斗争经验教训和积蓄发展武装力量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给以后一些地区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造成某些新的困难和挫折。

七、整风运动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由于广大党员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因此，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已经势在必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2月上旬，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

这时，中共广东省委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加强党性教育。中共南路特委在接到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后，印发了中央的有关文件，对地、县级领导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同时，在由广东省委派到南路工作的王均予主持下，成立了中心学习组，组织各县委领导成员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合浦中心县委领导人杨甫、黄其江、唐才猷等参加了南路特委中心学习组的学习。中心学习组成员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中央文件，联系南路和各

地实际，着重加强党性教育，反对个人主义，增强组织纪律性；在工作作风上，强调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提倡调查研究，克服主观盲动性等内容。学习结束后，南路特委布置各县、市领导回原地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整风运动。

7月，负责钦廉地区工作的南路特委委员、宣传部长杨甫，根据中央、广东省委和南路特委的要求，在合浦白沙宏德小学开办了党员骨干整风训练班，合浦中心县委委员和各区委负责人参加了训练班。训练班学员除了学习延安的整风文件，联系实际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外，还继续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党的建设的基本常识，并结合“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讨论，强调了对党员的革命气节教育和党性锻炼。

8月，钦廉四属各区党支部和党小组相继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在整风运动中，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方针。合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何达云还根据中央要求的“加强党性锻炼”的精神，谱写了《党性锻炼歌》，配合整风运动的开展。歌词中写道：“用革命做我们的事业，用决议做我们的武器”、“要在工作中掌握政策，要更好地统一全国”、“锻炼、锻炼，加强我们的党性锻炼”、“实事求是我们的作风，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在整风运动期间，钦廉地区广大党员传唱着这首歌，起到了很好的思想教育作用。

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充分利用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机会，结合合浦儒家巷事件的教训，再一次严肃了党的纪律，增强了党性和党的战斗力，加强了党内团结，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北海地区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八、合浦永信烟庄事件

烟庄的开设

杨甫自1940年到合浦后大多数时间都以化名合法身份居住在白沙宏德寺和梅菪垌村，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43年3月，杨甫担任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后，感到原合浦中心县委联络

中心宏德小学，虽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和可靠的群众基础，隐蔽性好，但地处钦廉地区东南边境，偏于一隅，交通不便，对地域辽阔的钦廉四属地区联络十分不便；加上杨甫又是外来干部，没有一个较好的社会职业掩护，很难应付当前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便于同各地党组织负责人的联系，杨甫想在合浦县城廉州建立起钦廉四属领导中心。杨甫又听说周楠在广州湾、温焯华在高州都以做生意人为掩护，故想在廉州城开个店铺做生意，作为掩护其公开活动的社会职业，于是，先后同原合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何杏雨、中共灵山县特派员阮明、中共钦县特派员卢文等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成，并认为廉州烟庄生意好做，建议办个烟庄，还能帮助解决一些活动经费。因此，杨甫决定在廉州开设烟庄，以做生意作掩护，把廉州城作为联络中心，加强对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

1943年下半年，杨甫即着手筹备开设烟庄的工作。筹备工作首先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是筹集资金问题。这时钦廉四属党组织经费非常困难，除了有限的党费外没有别的资金来源，杨甫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商量，由党组织发动家庭较富裕以及有私蓄的党员捐献，共筹集了近20万元国民党法币的资金。第二是烟叶来源问题。据中共灵山县特派员阮明说：灵山出产的烟叶质量很好，因而决定在灵山由中共党员开设一个小烟厂，其任务是收购烟叶，制成烟丝，然后运到合浦包装出售。第三是烟庄工作人员问题。原则上决定烟庄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是政治上不暴露，而又懂点业务的党员。最后在北海挑选了在公馆璋嘉小学教书刚放假回家的伍朝汉，在合浦挑选了中共廉北区廉州特派员陈普坤，在灵山挑选了店员出身的党员邓荣存。烟庄办起来后不久，杨甫又把中共廉北区北海特派员张放调到烟庄帮助工作。第四是社会化问题。杨甫决定找个本地商人合股经营烟庄生意，使烟庄社会化，以免被国民党特务怀疑。但杨甫在合浦只认识经常在广州湾至廉州之间贩运杂货的陈荣坤（廉州特派员陈普坤的哥哥），通过与陈普坤商量，陈荣坤答应同杨甫合股开办烟庄。

1944年春，烟庄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便在廉州阜民北路10号，租一间两层楼的铺子作为烟铺，并定名为永信烟庄。接着，以刘德才（杨甫的化名）为烟庄老板兼经理的名义，向合浦税务局申请了营业执照，并于1944年7月初正式营业。杨甫挂名烟庄经理，伍朝汉当烟庄掌柜，具体负责烟庄经营业务，邓荣存负责烟丝烤制和包装。陈普坤、陈荣坤两兄弟每日都在烟庄出入，但不负责具体业务。

永信烟庄的开办，党内知道的人不多，除了廉州特派员岑焕祥、南康特派员陈符隆、西场区特派员包恭、灵山县特派员阮明、钦州特派员卢文、防城特派员谢王岗等外，其他党内人员均不知道。为了保守秘密，杨甫规定：（1）永信烟庄不准存放党的文件；（2）各地来联络的同志不得在烟庄接头；（3）除烟庄工作人员外，不准任何党员在烟庄里住宿。杨甫白天在烟庄露面，夜晚都不在烟庄住宿。

开设永信烟庄，为杨甫的领导工作和钦廉四属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负责同志和交通员陆续到廉州或北海与杨甫联系。这时杨甫在廉州有两个秘密联络点：一个是

平田一中（现合浦一中）学生党员余富茵的宿舍“平园”，另一个是廉州特派员岑焕祥家。杨甫又通过伍朝汉婶母的关系，在北海“德国楼”（天主教堂）院内租一间房子，作为杨甫的秘密工作机关和住宿的地方，夜晚多数时间住在这里。

与国民党特务的周旋

永信烟庄开张营业和把合浦的工作安排好之后，杨甫于1944年7月离开合浦到灵山、钦县和防城三县检查工作和了解情况，直到8月底才返回廉州。8月30日上午，杨甫从烟庄出来，经过中山路时遇到了同乡陈干才，而陈干才公然对杨甫说他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陈干才的出现，使杨甫感到了严重威胁，当天晚上，杨甫回永信烟庄召开党员会议，将遇到陈干才的经过及两人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烟庄的党员，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准备随时撤退。大家在会上商讨需要采取的一些安全措施，如转移党报党刊及进步书籍、万一发生突然事件时走脱的方法等。与此同时，杨甫又将遇到国民党特务、烟庄可能已经暴露的情况转告了与他单线联系的各地党组织负责同志，要求他们提高警惕，以防意外。但是，由于杨甫认为已知道陈干才的特务身份，而自己有烟庄老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干才还不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可以与之周旋，从中探听敌方情报；加上这时党的经费来之不易，杨甫舍不得丢掉烟庄的资产。因此，杨甫未能采取果断的措施撤退烟庄，而是采取了一方面与陈干才周旋，另一方面想找别的商人来顶替经营烟庄的错误做法。

9月上旬，全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军开始向湘桂线进攻，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与越南的交通线。如果日军占领湘桂线，钦廉四属地区将成为敌后，党的工作和活动就变得繁重和复杂。因此，杨甫认为，虽然遇到了国民党特务，但不能在形势十分紧急的时候丢掉党的工作而跑开，只能一边应付着陈干才，一边抓紧时间布置钦廉四属地区战时工作。在宣传方面：一是揭露日军侵占湘桂线的阴谋目的；二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三是说明钦廉四属地区可能再度成为敌后的形势。在组织工作方面：一是在城镇上能隐蔽的党员就隐蔽下来；二是各中学的学生党员跟随学校搬迁，积极开展师生的抗日救亡工作；三是已经暴露的或难于隐蔽的党员全部撤到农村去，以农村党组织为基础，积极收集枪支弹药，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杨甫自遇到陈干才后，白天照常到永信烟庄露面，装作若无其事，其他烟庄工作人员也仍然照常营业。而陈干才自遇到杨甫后，就缠住不放，白天经常到烟庄找杨甫聊天。陈干才的一个青年助手杨善龙，也经常到烟庄找杨甫或其他工作人员聊天。这样，杨甫就与国民党特务陈干才、杨善龙展开了危险的周旋。

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陈干才到永信烟庄请杨甫到廉阳茶室饮茶时，告知杨甫别人说他是共产党员。杨甫从廉阳茶室出来后，预感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已步步逼近，便立即赶回烟庄召集党员开会，把这个新情况告诉烟庄的党员，要求大家小心提防。并商量决定：张放和陈普坤

（他俩都患有肺病）先撤离烟庄，暂住合浦医院留医。杨甫还决定将中共廉州特派员岑焕祥撤离廉州，调到灵山勾刀水当小学教师。9月19日傍晚，陈干才又来到永信烟庄，告知杨甫别人说他是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一部电台。从这些迹象表明，杨甫的身份早已暴露，处境十分危险。但是杨甫除了将这些情况告诉烟庄的党员之外，还是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撤退，而是为了最后向廉州中学和平田一中的学生党员部署战时工作，错误地决定推迟3天才撤离烟庄。

烟庄事件的发生

9月22日凌晨4时，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专员张国元调集八区专署保安团、“淮海”自卫队共1000多人，突然全城戒严，并包围了永信烟庄。伍朝汉、邓荣存从烟庄的后门逃出后不久就被捕了，烟庄也被查封了。与此同时，敌人在合浦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住在医院另一层楼的张放，由于得到在国民党“淮海”自卫队任少尉电务员的共产党员陈耀琪的及时通知，跟着陈耀琪离开医院，逃脱了敌人的搜捕。这就是国民党特务破坏合浦永信烟庄的事件。

敌人在永信烟庄没有抓到杨甫，即全城封锁交通，逐户搜查。此时，杨甫正好在平田一中学生党员余富茵的宿舍“平园”里。当敌人到“平园”搜查时，余富茵让杨甫到后院的杂草堆隐蔽起来，并叫屋主王大叔赶快去开门。王大叔把门打开，见到保甲长带着几个警察站在门外，便向他们说明这里只有他的女婿谭宏铨的几个学生住，如果他们不相信，就请他们进屋里检查。当向导的保甲长认为这位平时靠卖炒花生度日的酒鬼王大叔是老实人，不会说假话，于是带着那几个警察离开“平园”了。王大叔关上门后，余富茵急忙来到后院，将情况转告杨甫，两人立即将平时保存下来的大批党的文件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用水浸湿搓成纸浆，倒进泥坑里掩埋起来。由于廉州城保队和军警在夜间突然检查户口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杨甫还没有联想到永信烟庄会遭破坏的问题。天亮时，杨甫想出去看一下检查户口后的情况，便独自沿着“平园”外那条小巷往中山路方向走去，刚到街道口，看到还有军警在大街上巡逻。杨甫认为戒严还未解除，便赶快退回“平园”。余富茵把园门关上后，不让杨甫再出去，而由余富茵出去了解情况。余富茵来到烟庄附近，看到烟庄被封后，急忙赶回“平园”，将烟庄被封等情况告诉杨甫。但烟庄的同志谁被捕了还不清楚，杨甫让余富茵再出去探听情况。余富茵来到平田一中遇到张放，才知道敌人昨晚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两人简单交换了情况后，张放骑单车离开廉州前往北海，随后转移到钦州犀牛脚平山隐蔽。余富茵正要回“平园”告诉杨甫，凑巧在平田公路上遇到陈耀琪，他们就一起到“平园”向杨甫汇报。此时，杨甫才比较清楚地知道昨晚发生了永信烟庄被查封以及党员伍朝汉、邓荣存、陈普坤被捕的严重事件。

当天中午，街道上的敌人戒严还未解除，没逮捕到杨甫，国民党特务是不会甘心的。此时，杨甫认为在廉州城待下去是危险的，必须立即离开廉州，于是同余富茵和陈耀琪商量撤走的办

法。三人经过一番谋划，决定杨甫化装成公职人员，由陈耀琪用单车搭乘通过小南门、大南门、国民党“淮海”自卫队岗哨，送往南康。接着，杨甫迅速向余富茵布置了几件事：一是通知廉中党支部书记王献芝立即去灵山，将永信烟庄遭破坏的情况转告灵山特派员阮明，并嘱其尽快撤离烟厂；二是了解烟庄遭破坏和被捕同志的情况，报告中共南路特委；三是酌情决定撤退一些学生党员（如廉中的王献芝，一中的余富茵本人等），并关照进步人士一中教师符筑。然后即刻化装，杨甫扮成国民党地方官员，陈耀琪已穿着军官服装，戴着少尉胸章，佩上手枪。先由余富茵到小南门城头侦察一番，情况没有变化，便立即出发。此时大约是下午1时，陈耀琪骑单车搭着杨甫离开了“平园”，通过小南门出城到公路，又通过大南门，穿过定海桥，往福成、南康方向飞奔而去。在城郊站岗放哨的国民党“淮海”自卫队士兵（大多数是南康人，与陈耀琪很熟悉），看到自己的军官骑车搭着一个“官员”通过，非但没有进行盘查，还持枪肃立向他们举手敬礼，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下午4时左右，杨甫和陈耀琪平安到达南康。杨甫与中共南康特派员陈符隆取得联系后，立即叫陈耀琪迅速赶回廉州，把有关情况告诉余富茵，并叮嘱陈耀琪到北海了解杨甫租住德国楼的秘密机关是否被查封，如没有，就立即把杨甫的被褥衣物（没有文件）撤走。陈符隆则告诉杨甫，南路特委的交通员小陈来了，通知杨甫立即到特委去。于是，杨甫随小陈到白沙宏德小学附近把爱人谭德及孩子撤往灵山后，马上赶到广州湾南路特委机关，向南路特委书记周楠详细汇报了发生合浦永信烟庄事件的经过，检讨了自己政治思想麻痹、丧失警惕性的错误。周楠对杨甫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0月，南路特委决定：停止钦廉四属党组织活动，包括停止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和发展新党员，上下级之间只保持工作上的联系；对杨甫进行停职审查，指定阮明接替杨甫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对钦廉四属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审查。自此，钦廉四属的中共组织活动基本停止，直到1945年2月钦廉地区全面举行武装起义后，才逐步恢复钦廉四属党组织的活动。钦廉四属各地党员在停止组织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王献芝赶往灵山找到阮明，转告永信烟庄事件的有关情况后，灵山的党员及时撤离烟厂。合浦、灵山、防城、钦县等地党组织在知悉永信烟庄事件的情报后，都作了必要的隐蔽撤退，没有惊慌失措，显得平静和稳定。

杨甫离开廉州后，有胆量、有斗争经验的阮明从灵山来到廉州，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主动积极地做好永信烟庄事件的善后工作，组织党员进行隐蔽，继续坚持斗争。阮明到廉州后，最关注的是伍朝汉等3人被捕的事，并想方设法营救他们。伍朝汉等3人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合浦保安团部和合浦监狱，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几次审讯，他们只承认是做生意的，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组织的秘密，也没有说过对党不利的話。国民党广东第八区专署反动当局抓不到他们的证据，加上此时日军南侵，形势紧张，只好把他们投入合浦监狱关禁起来。阮明为了探清案情，多次在晚上到东门口地下党员邓松家，通过邓松、陈耀琪在专署的特殊关系，了解到专员张国元、保安副司令陈国勋审讯伍朝汉等3人的情况，还查阅了审

讯记录卷宗。邓松、陈耀琪这两位地下党员，为营救在狱中的同志，默默地做了许多别人所不知的重要工作。1944年12月，日军从南宁向广州湾转移，途经廉州城，合浦国民党反动派弃城而逃，看守合浦监狱的国民党军警也闻风而逃之天天，伍朝汉等3人和同狱难友乘机越狱出来，到了附近农村隐蔽。后来，伍朝汉、陈普坤到南康找到了党组织，邓荣存回灵山也找到了党组织。阮明在合浦活动了几天，直到合浦的情况稳定后，才到广州湾向南路特委机关汇报。

烟庄事件的审查结论及教训

永信烟庄事件不但破坏了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地下机关，逮捕了3位党员，而且中共南路特委为了审查这次事件，停止了钦廉四属党组织活动，使钦廉四属党组织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组织活动处在无政府状态，严重影响了武装斗争和党组织的发展。南路特委对永信烟庄事件进行了严肃审查，事件主要当事人杨甫则在1947年华东局党校整风审干学习班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接受审查，作出了审查结论：永信烟庄被破坏，不是钦廉四属党组织内部有人叛变出卖，而是由于党组织负责人杨甫政治思想麻痹，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警惕性不高造成的。审查结论的依据是：(1)杨甫遇陈干才及与其周旋的整个过程的情况，自始至终都及时告诉了烟庄的党员，并通知了有关党组织负责人及与杨甫单线联系的党员，也作了一些防止事变的安排；烟庄事件发生后，除烟庄的三位党员被捕外，党的组织和其他与杨甫单线联系的党员都未受任何损失。因此，完全可以排除杨甫政治立场上的问题。(2)烟庄的党员以及与烟庄有联系的其他同志，都未发现有政治立场上的问题；作为既是烟庄合股人，又对烟庄内情有所了解的党员商人陈荣坤，虽然社会背景比较复杂，但也找不出他在当时的条件下通敌的理由根据和事实根据。因此，党的组织或烟庄内部有人叛变出卖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永信烟庄事件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但是，有几点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1)严重的政治思想麻痹。当杨甫的身份及烟庄已经暴露的时候，不能当机立断进行撤退，而是优柔寡断，被所谓“同乡”、“熟人”和特务的花言巧语麻痹了，以致迟迟不能下决心转移，使敌人能从容地破坏了烟庄，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2)指导思想不正确。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特务在合浦县的活动日益加紧，合浦县党组织继续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这样的形势下，单纯为了“方便联系”而把党的领导人的隐蔽机关从农村搬入城镇，这是因为党的领导人“不以农村为中心而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带来的结果，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3)人员的选择不够慎重。伍朝汉在合浦一中读书时，曾因共产党员嫌疑被捕过，后又被学校认为思想赤化责令退学，借读到廉中后，又参加了小江米案斗争；陈普坤曾因参加小江米案斗争被校方开除了学籍，把这些在政治上已暴露的党员安排到党的秘密工作机关是不适当的。又以党的主要领导人出面作烟庄老板，这显然是不符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的原则的。